Co-China 周刊

NO. 174

2014年10月3日

朱涛：在地面行走的权利｜朱凯迪：庶民政治系列——凉亭被拆，女王像长存｜周思中：在解殖的街头｜梁启智：香港人的三个中国



编者的话

9 月 22 日学生罢课，9 月 27 日添美道集会，9 月 28 日凌晨，香港的这场社会运动于政府总部东翼入口广场（公民广场）提前启动。此后几天，香港市民占据了包括旺角、铜锣湾、中环、金钟等地的交通干道——这是一场占领运动，但已经不是起初设想的“占领中环”运动，有部分国际媒体将这场运动称为“雨伞革命”，在香港，它也被称作“遮打革命”。

“中环”一直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中心。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朱涛认为，传统的“中环”概念包括香港立法会、高级法院、政府总部，人群占领中环车道对政府施加的压力比其他任何地方（如新界）都要大。此外，在海富中心、港澳码头、汇丰银行等机构聚集的中环，一旦交通瘫痪，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会遭受很大损失。

中环是占领运动的计划发生地，实际发生时，人群布满添美道、遮打道、夏悫道、干诺道、弥敦道……在地面空间几乎处处割裂的香港，人们突然拥有了占领交通要道的权力。它更像是一场重夺公共空间的运动。甚至连提前占中的发生地公民广场，也是香港市民夺回的公共空间：根据规定，市民每周可有一天在政总东翼前地递交请愿书，2013 年反国教时，学生代表也曾在这片空地静坐示威；现在，学生代表和其他市民在这片不大的公共空间集会，把它变成了“公民广场”。

本期 Co-China 周刊，我们尝试从香港特殊的空间现状入手，重新观察这场占领运动，乃至整个香港的空间政治。审视过去，香港的社会运动从来都和空间紧密相连。人们争取权利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空间权利受侵——保卫菜园村是，反对拆除皇后码头是，反高铁也是。

第一部分的时间轴、图片和张洁平的占领香港笔记都梳理了几日来人群的移动路线。自由亚洲电台和香港学联的两篇文章陈述了民众和政府对待同一块地的不同态度。朱涛的文章更详细地解释了香港的空间构造——大部分地面行走的空间被分割到地下和空中。他认为，行使空间的自由才是更大范围自由、民主的基础。

选文第二部分围绕政府的政治和庶民的政治讨论香港过往的社会运动。政府总部的围栏象征着政府的特权和与民众的对立，维多利亚花园的凉亭、西洋菜街的行人道和小贩占据的香港街头，都是普通人的空间，它们被销毁、被挪移、被驱赶——抗争空间侵犯，也是抗争特权，追求民主。

最后，周思中回顾香港过去的社会运动，指出这些空间的争取，都是香港作为前殖民地的解殖过程。这样看来，香港 9 月底的这场运动，更加彻底地完成了香港的解殖化：人们不再前往传统殖民时代的运动发生地皇后像广场，从狭义的中环转移到了广义的中环（包括中环和金钟），从遮打道到夏悫道——这是一场在香港政府总部发生的运动，人群甚至涌向了商业中心铜锣湾和旺角。

站在更广的视角上看，许知远和梁启智的文章都点出了社会运动和参与人之间的纠葛。不论是运动倡导者陈允中、司徒薇，还是每一次运动中的普通市民，他们都不断面临地点转换和身份转换。香港和中国内地更是如此。一座不算长的罗湖桥让香港对中国产生多重想象：罗湖桥那头让人感到可怕、恐怖，又饱含诱惑，罗湖桥这头，香港有时还看见自己身上那个带着些许飘渺的文化中国。



目录

编者的话 2

【1】 5

新公民运动：雨伞革命 28 小时（时间轴＆图辑） 5

Code4hk：罢课 926 重夺公民广场时间表 10

张洁平：占领香港笔记——从广场到马路的 72 小时突变 11

夏晨：港府突封闭公民广场 动机惹批评 15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政制公义不彰 重夺公民广场 18

朱涛：在地面上行走的权力 19

【2】 25

黎隽维：政治总部的小学鸡空间政治学 25

朱凯迪： 庶民政治系列——凉亭被拆，女王像长存 28

马国明：小贩：拉阔香港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31

【荐书】 张赞国，高从霖：《涂鸦香港——公共空间、政治与全球化》 38

【3】 39

周思中：在解殖的街头 39

许知远：爱人同志 46

梁启智：香港人的三个中国 50

【1】

新公民运动：雨伞革命 28 小时（时间轴＆图辑）



28 日 1:39 三子到达会场，并宣布提前占中，要求人大撤回整改框架，重启政改。戴耀廷表示，若政府未能满足要求，行动将升级。

1:40 场内示威者拍掌鼓舞，并大喊“饮胜”。

1:52 和平占中所有物资陆续搬入政总会场，纠察队、义工进驻会场，并整理铁马筑造工事。

2:44 政总继续增加警力，由一排增至三排，约有 40 人。

3:14 黄之锋被羁留超过 25 小时，其家人于凌晨发出新闻稿，批评警方仍拒绝处理之锋的保释申请，及交代释放时间，认为持续羁留是出于政治原因，甚至是政治迫害。又要求警方停止滥用权力，立刻释放 17 岁的之锋。

4:22 梁国雄在政府总部各处下跪，恳求民众留守。他指下跪不是认输，而是感谢到场支持学联和学民的人，敢于抗争的香港市民。他发言后民众鼓掌，但仍有部分人散去。

5:00 场内示威者陆续休息，席地而卧。



8:10 政总停车场外的防暴警察戴上黑手套，亦有一些白衣督察和约十名警员增援，但未见有换班。大会工作人员开始为公园内的铁马系上索带，加强防护。

8:29 有大约三十辆警车包围政总。

8:56 公民广场对出、龙汇道、政总停车场附近，示威者防线松散，多用伞遮光，席地而眠。

9:23 龙汇道开始筑起水马阵，义工呼吁示威者收集用剩的瓶装水，讲瓶内的水注入水马，加强防御。

11:03 大会今早安排音像公司运送约 10 箱音响器材进场，但遭便衣警察阻止，警方抄下搬器材人士资料。多名立法会议员在内的示威者与警方理论，一度冲突。

11:30 添马公园国庆嘉年华开始，现场约有 80 人。

11:45 大批警员增援，音箱充公，约 7 人被捕，包括立法会议员刘慧卿、何俊仁、张超雄。示威者手拉手坐警车前不予放行，要求归还音箱。（警方怀疑音箱用作非法集会用途，不予进场。集会人士表示音箱有助于场内秩序。）

13:45 警方开记者会，宣布开展清场行动。

13:56 警方封锁往演艺学院天桥，并组成三道防线。桥上约有 500 人，有市民陆续越过警方防线，爬上警察总部对出天桥，要求警方放行。部分市民则转往天域街天桥。

14:12 市民陆续增援，金钟站 A 出口有大批市民被围困，要求警方开路，放行前往政总。

14:21 龙汇道封锁线多次举起黄旗，指警察封锁线不得越过，并有三排警力包围集会人士。

14:33 往夏慤道天桥因警方封锁，有市民于天桥下阻挡行驶车辆，横穿马路。其间，多位司机停车配合，并鸣笛声援示威者。警方表示稍后封路，大会亦劝谕市民不要乱过马路。

15:08 海富中心天桥往政总天桥，一男子爬上桥边花槽抗议。谈判专家到场，劝谕该男子“返落嚟”。消防在桥下充好气垫，占用一条车道。

15:20 添美道入口、海富中心及演艺道布防的警员均已戴上头盔，市民准备雨伞、眼罩和保鲜纸随时应对胡椒喷雾，气氛紧张。

15:24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被羁留超过 36 小时，仍未获保释。律师卫智达将于三点半向高等法院，为其申请人身保护令。

15:30 特首梁振英召开记者会，回应占中。



15:43 海富中心附近，警方派出四辆警车到场，警员亦全部戴上头盔，手持胡椒喷雾，准备清场。

15:45 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就占中行动启动违法占中及要求推倒人大决定及重启咨询，非一般市民表达方式，是违法行为。梁亦表示，特区政府一定会维护香港市民的权益。

16:04 未进入政总的示威人士，部分占领告士打道往北角方向车道，亦自动让出单车道予车辆行驶。警方在告士打道带走十名示威者。

16:14 海富中心附近示威者已成功占领夏慤道双向车道，反包围警察。警方施放胡椒喷雾，但有警员“中招”。同时，有市民冲出龙汇道马路，高呼“占领对面行车线”，现场人士不断欢呼。

16:23 梁振英表示，愿意就政改和任何人倾，但前提若是推翻人大决定则不符合基本法，不会有建设性结果。他欣赏大专及中学生对时事关心，但重申表达意见需在和平方法下进行。对于出动防暴队的质疑，梁指相信警方执法的专业判断。

16:27 由添美道至龙汇道，有大批市民冲出马路，成功占领告士打道双向车道。市民高呼“释放黄之锋”、“梁振英下台”。警察遭反包围后撤离，现场示威者大呼警方收队。
16:27 学联表示，集会场内有两万人，海富中心有一万人参与。

16:39 大批示威者冲出夏慤道，占据车道，并高呼“抗命不认命，梁振英下台”。

17:04 添美道警察正使用水炮疏散人群。干诺道中交通亦被瘫痪。位于夏慤道的警察机动部队戴头盔持盾牌等防暴装备，并向人群施放胡椒喷雾，驱赶占马路的市民。有在场人士受伤，需要急救。

17:25 夏慤道，警方与现场人士发生冲突，警方全戴上防毒面罩，并向示威者施放胡椒喷雾，甚至有大胡椒喷雾待命。市民用雨伞遮挡，更有学生被警棍打伤。

17:42 海富中心外面的夏慤道，用作封锁的水马被示威者拆走作脚踏，示威者又向中环推进。有现场采访的记者被胡椒喷雾射中。

18:02 警方向聚集在干诺道中及夏慤道的示威者出动黑色警告，并施放至少两枚催泪弹，同时，警告会再使用催泪弹。

18:14 香港独立媒体记者站于栏杆拍摄时，警察向该名记者表示“你再唔落黎我即刻开枪”。

18:17 金钟站内有大量警员，不少记者在地铁内大声呼叫前往者转用告士打道 D 出口。金钟站内大部份便利店落半闸不做生意，邻近的面包店亦落半闸，有人正大量购下面包食量。



18:35 在场不少市民大声责问："何以释放催泪弹？请保护学生。"大量市民抵住前线位置，添美道已站满前往做人肉盾牌的市民。

18:40 《学联和学民向政府做出的联合严正声明》表示四诉求：一，开放公民广场及添美道予群众集会；二，梁振英以及政改三人組下台；三，收回人大决议；四，公民提名必不可少。

19:09 警方再次施放催泪弹，本聚集于夏慤道的市民，因警方多次投掷催泪弹，已渐走向中环方向，沿路不少市民受伤，懂急救的人前往帮助市民。另，现场有警员手持长枪。

19:22 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呼吁发动全港罢课。

19:36 地铁不停金钟站。

19:45 黄之锋成功申请人身保护令，律师携手令到中区警署，黄便可获释，法院指警方无合理理由长时间拘留黄之锋。

19:59 中联办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占领中环"是非法集会。

20:24 警方在分域街警告有催泪弹气体，人群将该处警员追走。骆克道同样有警员防线，并举起催泪弹警告，后施放一枚催泪弹。

20:25 黄之锋已获无条件释放。周永康和岑敖晖仍被扣留。

20:37 由于前线局势不确定性，《新报人》政改号外小组决定集体撤离冲突区，但仍有数名学生记者决定以公民身份留守。

21:00 大批警察从不同区域前往金钟。

21:30 金钟海富中心，有市民以杂物堵塞地铁站出口，以防警察增援。

22:00 中环地铁站有市民阻止防暴警察前往金钟，警察连续施放三次催泪弹，其中一次是近地铁站 K 出口施放，市民避往地铁站，港铁落闸不予进入。市民强调"无意冲击"。

22:09 花园道附近电车路聚集大量配备盾牌的警察。

23:59 添美道已清场，仍有部分市民留守。

29 日 0:11 数百名市民集结旺角弥敦道，有示威者冲出车道于十字路口静坐。

0:22 大批集会人士由夏慤道住天桥方向前行，加強前方支援。

0:37 警方同时于夏慤道和干诺道中连续释放多枚催泪弹，直接射向示威人群，集会人士向金钟站走避。

0:39 大会呼吁民众撤离金钟。



0:45 夏慤道人行天桥夏，有大批防暴警察和相当数量警车驻守。警员戴上防毒面具，多次发射催泪弹。市民开始向防暴警察前方聚集。一名示威者站在警员面前，即便警方施放催泪弹也不愿离开。

1:01 于解放军驻港办事处外，警方多次施放催泪弹，有市民跪在防暴警察前，而有现场市民表示，警方在第一次施放催泪弹前没有出示警告。

1:19 旺角弥敦道现场有 7 辆警车，有配备防爆装备的警察出动。其后有市民坐在警方面前并指责警察只为权贵工作，市民基本上已反包围在场警察。

1:36 梁振英就“占领中环”向全港市民讲话，表示无意出动解放军及警方开枪。

1:59 夏慤道和添美道对出，警方再次施放 3 枚催泪弹驱散集会人士。记者所见，警方在施放前并无给予警告。另有消防车驶入现场。

2:10 警方在添美道再次施放催泪弹。

2:26 教育局宣布湾仔及中西区学校，包括幼稚园、中小学及特殊学校全日停课。

2:27 过千中大学生通过无限期罢课。

4:16 葵青七间中学宣布罢课一天。

4:43 夏慤道示威凌晨未有平息。

5:57 又一天天明。

来源：《新报人》FB 主页。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Code4hk：罢课 926 重夺公民广场时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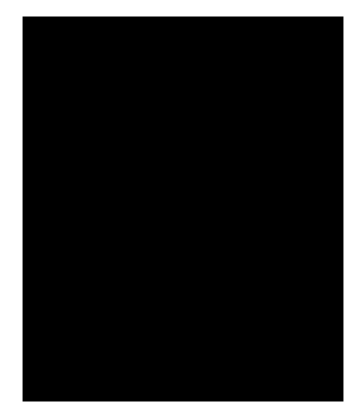


详见：https://www.google.com/maps/d/u/0/embed?mid=zIh97OmUhBNA.kGMqBtuPdC04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张洁平：占领香港笔记——从广场到马路的 72 小时突变



自由撰稿人

“

这一夜，因为一个试图进入常规集会空间而被阻止的举动，引发了形势第一次的根本转变：你不许我进入公民广场，我就去外面开拓新的广场。

”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打乱了所有严密布局的计划，无论是起事者的，还是管治者的。而一切又发生得太自然，像一场压抑已久的高烧，淋漓尽致。

香港人大概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去占领全城的马路。争取民主普选是一场长达 30 年的谈判，而如果争取失败，则有一套按部就班的抗命行动——这大概才是香港人做事的方式——在 9 月 28 日之前，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占领中环”运动酝酿了整整 20 个月。从去年一月，法学教授戴耀廷在报纸上提出构想开始，历经舆论预热、民主商讨、公民投票，先礼后兵，直到全国人大真的否决了香港真普选的希望，才启动行动，预备要“占领中环”。如果行动按原计划进行，这恐怕会是世界历史上姿态最卑微的“公民抗命”：我们讲尽道理，不得不“抗命”，“抗命”的方式，不是最初构想的“瘫痪金融中心”，而是选择在节假日，以对公共秩序影响最小为前提，坐在马路中间（这条马路节假日会被批准为行人专用区），等待被捕，用自我牺牲，结束整场运动。

“占中”核心团队的成员曾私下告诉我，在人大决议给香港普选“落闸”之后，他们原本对行动本身已经非常悲观。“香港人太现实”，他说：“知道没用的事情不会去做”。“占中”内部，对愿意走出来、坐在马路中间“自我牺牲”的人数预期是 5000 人，占领时间是最多两天。这是一个悲观的预期，形势逼他们只敢做最坏的打算——他们把行动日定在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因为中国领导人不愿意在喜庆节日生血光之灾，便可能避免残酷镇压。

谁也没想到在 9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全港学生大罢课之后，形势突变。



9 月 26 日晚上 10 点 30 分，在结束了一个星期的罢课之后，连日集会的学生、市民正待散去，学民思潮召集人、17 岁的黄之锋在短暂宣告后，突然带头翻越围栏，冲入“公民广场”——这一块政府总部门前空地，是规划的公众集会用地，曾在 2012 年反国教运动中成为最主要的抗议地标，并因此得名“公民广场”，而在 2014 年 7 月 17 日，接近人大表决香港普选方案的日期，港府突然封闭这块用地，直至 8 月底再度开放时，四周已经满满修建起两米高的钢铁围栏，实质性破坏了这块一千平米空地的集会效应。那一天晚上，在“重夺公民广场”的口号带领下，学民思潮的黄之锋、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岑敖晖等 100 多名学生，不顾一切衝了进去。黄之锋很快被警察按倒在地，用胡椒喷雾制服，并直接拘捕，其他百余名学生则由赶来增援的警察团团围住，困在“公民广场”之中。正在散去的人群汹涌起来，聚集在公民广场的铁栏杆外不肯离去，并有更多人赶来声援，人们整晚高喊口号：“释放学生！”“学生无罪！”“警察可耻！”

这一夜，因为一个试图进入常规集会空间而被阻止的举动，引发了形势第一次的根本转变：你不许我进入公民广场，我就去外面开拓新的广场。

9 月 26 日，据学联的估计，有数千名市民在政府总部四周的区域通宵留守。这片不规则的区域包括了政总建筑物旁侧的一条马路，一个圆形交通路岛，和立法会后门旁的一小片空地，留守的人们开始把这里叫做“自由广场”。这一个夜晚，集会者第一次见识了胡椒喷雾——警方六度施放胡椒喷雾试图驱散集会，并曾动用警棍，并无防备的学生则撑开雨伞抵挡胡椒喷雾，并搬动铁马在“广场”的各个入口设置路障，抵挡警方清场。附近天桥上围观的支持者也撑开雨伞掷下，让它们飘落到集会者手中，在整晚紧张对峙的气氛中，定格了颇为浪漫的画面。

他们终没有能够阻挡警方。周永康、岑敖晖等闯入公民广场的学生在 9 月 27 日一早的清场行动中被带走。而集会者亦因此决定，死守这里不走，直到警方释放所有学生为止。“占领中环”运动的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以及泛民主派许多重要人士很快赶来到现场声援留守学生，到了夜晚，在新的“自由广场”——恐怕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最不规则的广场——聚集起将近五万人。

学生们在马路上、天桥上、草地上、以及四周的工地上或坐或躺，并成立物资站、急救站，接纳市民源源不断送来的食物、水与抵挡胡椒喷雾的雨伞、口罩。他们还搭起了帐篷厕所，不过因为多数人觉得不够卫生，立法会外的公共厕所仍然排起长长的队伍。

9 月 28 日凌晨 1 点 40 分，经过占中与学联的共同商讨，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占中放弃原定的计划，决定即时、就地启动。仅仅十几个小时以前，他还声明不会提前开始占中，也没有计划把占中地点转移到政府总部。但造势不如就势，这十几个小时里，现场人群的生动能量显然改变了他们的决定。



这个决定令不少支持占中的市民叫好，却也引起现场学生的争议。许多学生在凌晨两点左右离场，他们说自己是来支持学生运动，呼吁释放被拘捕的学生，却没有打算要“占领中环”。但留下来守夜的年轻人，仍然接近万人。

彷彿对这一变化措手不及，尽管留守者进入高度警惕的防备状态，但这一个夜晚，警方没有任何行动。守了一夜的学生在白天疲乏离去。在“自由广场”人数最少的时候，9 月 28 日下午 1 点 30 分，警方宣布，开始清场。他们实施人群管制，封锁政府总部附近示威区的所有入口，只准出不准入，并称“任何公众人士强行进入将被检控，场内人士将被拘捕”。学联及占中则立刻通过网络告急，呼吁市民前来支援，一起守住这里。

谁也没想到，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四面八方赶来的群众就聚集在进入政总示威区的各个通道上，不但对警方封锁线形成了反包围之势，更随着聚集人数越来越多，由于无法进入政总示威区，反而一直蔓延到了附近的交通干道上。人们乾脆坐下，就地在马路集会。

9 月 26 日，从“公民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开拓“自由广场”，是抗争的第一次空间转化。9 月 28 日，从“自由广场”的封闭演变为占领马路则是第二次，这一次，也彻底地转变了抗争的性质。

到下午 4 点半，人们已经完全占领了金钟的车行主干道，并向东蔓延到湾仔，向西蔓延到中环。宽阔的车行路和起伏的高架桥上坐满了人。天桥上也挤满了人。被封闭在“自由广场”内的学联同学们看到手机里转播的场外画面，泣不成声。占中三子也激动不已，这是近两年来承受着巨大压力的他们，不敢想像的画面——戴耀廷当初在报纸上大胆构想，也只说“一万人占领中环”而已。

不过，作为行动最初的召集与组织者，他们还来不及对隔离在外的数万群众（不断增加中）做出呼应，警方的行动就已经令事态再次急转。

根据梁振英下午 3 点半记者会上的表态，警方会“果断依法适当”对付“占中”。当晚 6 点开始，警方突然对和平示威人群使用催泪弹，据后来警方公布的数字，在 9 月 28 日夜晚到 9 月 29 日凌晨，香港警方共在 9 个地点，发出了 87 枚催泪弹。这是自 1967 年左派暴动以来，警察第一次对香港市民使用催泪弹（2005 年 WTO 在香港召开会议期间，警方曾对南韩示威者使用过催泪弹）。

所有人都震惊了。当天下午有家长带着孩童来参加集会，没有人想到两三个小时的集会就会引来催泪弹。而更令人震惊的是，催泪弹并没有驱散人群。被激怒的集会者回到原地坐下，有更多的人被电视直播画面或者网络图片震惊，决定出门前来声援，从 6 点警方抛出第一枚催泪弹开始，从中环到湾仔马路上的人群不减反增，晚上更增加到是十数万人，更蔓延到九龙的旺角地区。

晚上 10 点 20 分，学联突然发布声明，称从多个渠道获得消息指警方已经以橡胶子弹驱散示威者，呼吁示威者全面撤离，“保留实力，择日再会”，占中也即做出相似表态，“一旦开枪或启动音波炮，呼吁市民全面撤离”。然而，仍然有大批市民选择在马路上彻夜留守。一直到 9 月 29 日白天，人群依然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在港岛从中环一直铺到铜锣湾，在九龙也从旺角蔓延至尖沙咀。

催泪弹变成一个有形而具体的“镇压标志”，不仅激化了局势，促使更多普通市民走出来坐在马路上，也实际上加剧了运动性质的转化：这已经不是由几个领袖人物发起的“占领中环”运动，也不只是学联或者学民思潮发起的学生运动，而成了一场因为“敌人”团结起来的，真正去中心化的全民运动。

这个“敌人”，表面上是催泪弹，实际上是抗争者赋予它的政治含义——一个作为北京政府傀儡的香港政府，对香港过半数市民民主诉求的不承担，甚至协同打压。这个时候，是否要遵循“占领中环”的理念和议程已经不重要了，每一个坐在马路上的人，都带着自己个体的愤怒和诉求，他们的最大公约数，恐怕只有那个人大已经明确否决了的真普选。

被困在“自由广场”之内的主台很快就失去了作为主台的意义。9 月 28 日，占中三子、民主派大佬、学生领袖都坐在主台上，没有警察去拘捕他们，催泪弹都瞄准了马路上的群众。9 月 29 日，警察撤防，也没有群众再进入“自由广场”。3 公里长的马路已经成了新的“广场”，而且无边无际，无人可以真正代表。

在这条马路上走一遍，你可以看到真正的香港精神：那种井然有序、令人惊叹的自组织，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浪漫的歌声和字条，周围店铺的友好，深夜里和警察一起清扫垃圾的年轻学生。还有一边施放催泪弹，一边全副武装向前推进的警察，扶起在烟雾中摔倒在地的市民，送到安全区。你知道这是不管多么愤怒，都没有改变的香港，良好的公民社会根基，让自主和自律在绝大多数公民身上完美统一。

但你也知道，在对面的阴影里，还有一种力量，也不会改变。一旦“广场”无边无际，无人代言，无法收场，这也是真正的危险临近的时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夏晨：港府突封闭公民广场 动机惹批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

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最能聚集人，但附近亦有很多地方，例如：添马公园，甚至是政总外的道路，如添美道、添华道、夏慤道，这些主要道路，更关键，是道路要塞，必要时可能被逼到那些地方进行公民抗命。

”

被请愿人士誉为“公民广场”的香港政府总部东翼前地，特区政府周四（14 日）早上突然宣布即时封闭，以便进行加强保安的工程，封闭令直至 8 月底为止。政府的举措立即受到不少批评，指有违政总大门常开的设计意念。（夏晨报道）

香港学联早前表明，若中央在政改中否定公民提名，会发起公民抗命或包围政府建筑物的行动。

学联副秘书长岑敖晖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今次政府关闭公民广场的行动，与市民的抗争活动有关，显露出政府的心虚和胆怯，反而会令市民走上街。他亦指，示威的地方不限于政总。

岑敖晖说：你说有没有关连，我相信是一定有的，因为政府知道其实他做的事是不得民心、与民为敌，所以有这些措施防止人去抗争或包围政府，我相信他这样做是非常愚蠢及可笑。在 7 月 1 后，抗争地点、示威、集会，不只政府总部，可以在不同的主要道路或建筑物，所以政府的做法不单止不能阻止大众，反而显露心虚及无知，会令更多人走出来。

岑敖晖指，只有政府总部侧门的添美道，可以作为示威的地方绝对不足够，可能会逼使示威者占领其他道路。

岑敖晖说：政府总部的公民广场，最能聚集人，但附近亦有很多地方，例如：添马公园，甚至是政总外的道路，如添美道、添华道、夏慤道，这些主要道路，更关键，是道路要塞，必要时可能被逼到那些地方进行公民抗命。

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即使把公民广场关闭，也不等于示威者会停止示威行动。



刘慧卿：把它关了又怎样？关了不就是走上街，上街就要封路，这不就造成更大件事吗？我也不知是谁想出这么差劣的方法，你以为关了就没有人来示威吗，是谁告诉他的，希望不是冯炜光。

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主席涂谨申，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有没有削弱示威空间，要视乎完工后公民广场的示威安排。他说，造成今日的局面，特首难以挽回。

涂谨申说：最重要是政府施政可以，但可能他认为“政改”不到他话事，但在这问题，他面对大规模人群的抗议，“占中”不止占中，可能会占领立法会、政府总部，在这问题可能他也无力挽回，因为不是他决定，是死局。

对于加强政总保安安排，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认为，政府是为防范于未然。

谭耀宗说：我想是，见到有人冲击立法会，政府总部加强措施，而且听到未来有“占中”行动的出现，我想这是防范于未然。

署理警务处处长马维騄下午见记者，表示经过与行政署的商量，决定在政总设围栏，强调这是预防措施，亦确认周四早上有一队机动部队在政总工作，原因是担心加设围栏后，会有冲突发生。

马维騄说：大家都应该留意到最近，无论是政总、立法会，在这两个月都出现大大小小的公众活动，有平和的，也有需要警察处理的，所以警察的责任之一，有时需要预防，作出适当的预防，如果没有需要，我们不会安排任何警务人员，但这是经过风险评估，而作出适当的部署。

而行政署发言人表示，围栏只设于东翼前地范围的周边，对容纳集会人数的影响轻微，现时前地可以同时间容纳约 2000 人和平集会。

政府于早上七时发新闻稿，指即时起至下月底，会关闭政总东翼前地，以便在添美道及东翼前地与立法会大楼之间，加设竖立围栏，增强保安。而政总东翼的保安措施将与西翼看齐。

发言人补充，在工程完成后，市民可于周日及公众期假的指定时间内，在东翼前地举行公众集会或游行，但须事先取得行政署批准。

过去，香港一些大型集会，例如：反对国民教育、抗议政府电视发牌制度不公等，大批市民亦曾于政总示威、请愿。在“反国教”示威期间，学民思潮成员曾一连三日在政总门外扎营；而抗议电视发牌不公平的集会完结后，有香港电视员工留守政总 19 日。




我在中國
論壇
Co-China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政制公义不彰 重夺公民广场

香港最大的学生组织。由八所大专院校学生会组成，旨在推动学生运动和增加学生对社会的投入。

> “
> **近年来政府不断打压公共空间，渐渐削弱公民社会的力量。由打压旺角行人专用区，到封锁公民广场，到拒绝民阵申请游行，一桩一桩事件渐渐收窄公共空间，削弱公民之间的连结。**
> ”

公共空间是构成政治社群的首要条件。交流、讨论，甚至单单聚集，本身已经形成集体的政治参与。没有公共空间的话，资讯不能流通，我们的社会只会变成一个圆形监狱。在很多社会运动中，公共空间都成为召集群众的重要一环。而且，公共空间不在乎原先的内容、目的，人民起在一齐，就会发挥意想不到的力量。

然而，我们的极权政府都意识到这一点，故近年来政府不断打压公共空间，渐渐削弱公民社会的力量。由打压旺角行人专用区，到封锁公民广场，到拒绝民阵申请游行，一桩一桩事件渐渐收窄公共空间，削弱公民之间的连结。

我们是否甘愿一直活在鸟笼之中？我们是否甘愿被继续愚弄，让政府的爪牙伸展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政府可以安全限制你进入公众地方的自由，将来就可以限制你的出入自由，很快，双手双脚都会被綑绑起来。

如果他们在家园前建牆，我们就把它推翻，如果有人拦着我们的去路，我们就作战到最后一刻！在不公义的社会之中，我们要考虑的，是道德，不是法律。

政制公义不彰，重夺公民广场！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朱涛：在地面上行走的权力



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

> “香港还有一个核心价值，也非常珍贵，比自由、民主等价值更具体、更有形，但它却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市中心的地面——我们可以在市中心舒适、自由地行走、休息、聚集，组织各种公共生活，进行集体行动的地面。它是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空间基础。”

地面——香港的另一核心价值

什么是香港的核心价值？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这些价值当然重要，也正是我们今天要全力争取的。今天，作为一个建筑师，我想说：香港还有一个核心价值，也非常珍贵，比自由、民主等价值更具体、更有形，但它却往往被忽视：那就是市中心的地面——我们可以在市中心舒适、自由地行走、休息、聚集，组织各种公共生活，进行集体行动的地面。它是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空间基础。

车行至上的规划对步行的破坏

香港是个技术官僚统治的城市。很多官员和规划师们仍持有陈旧的观念：地面应主要用来满足车行交通，让汽车开得越快越好。他们惯于让快速车道和停车库占据地面，用三种办法对付行人：

1）压到地下，比如尖沙咀-尖东一带：为了行车便利，越来越多的过街人行道被栏杆封起来。行人们不得不钻到地道网里才能穿行街区；

2）抬到空中，比如这个政总。示威者从维园集合，一路步行，高呼口号，到这里，积蓄起来的能量一下子全散了：游行队伍不得不变成单股人流，示威者个个俯首贴耳，要排队上一部手扶梯、一部电梯和一部楼梯，经过空中平台，穿越快速干道，才能到达这个号称“门常开”的政府总部。这政府门前的“瓶颈效应”是对公民行动的一种多么刻薄的打压和戏弄？



3）地下和空中结合，比如中环地铁站到交易广场-IFC-天星码头，湾仔地铁站到湾仔会展中心和湾仔码头。这里特别提一下：本来从金钟地铁站到海滨长廊的连接，按香港的常规做法，也是地道加天桥的双重连接。尤其像政总这样的建筑，是市民常来的公共设施，更应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但立法会 2003 年一份报告说，政府担心恐怖袭击，决定不在政总和立法会地下建任何铁路车站和隧道（《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及交通事物委员会——天马建发展项目与公共交通服务》2003 年 5 月 27 日），于是才落得今天的局面：政总“门常开”——主要朝着北面海对岸尖沙咀游客的镜头开，它的南面与金钟闹市的连接却只有一座天桥，香港市民很难走进来。

大家再看看眼前这中区海滨长廊，花这么多钱填海造出来的，这么好的景观，公众如何从闹市区走过来？香港岛多年来依赖一层层往外填海，征得地皮，然后惯性地在最外边修一条快速干道，这极大地阻隔了市区行人向水边的通达性。从天星码头到湾仔会展中心，这约 1.5 公里的海滨长廊，市区与它的主要步行连接处只有三个：中环到天星码头、金钟到政总、湾仔到会展中心和湾仔码头。但这三个连接，有哪一个是能让行人体面、舒适地在地面上走过来的？

技术官僚们几乎把维港海岸——世界上最美的城市海岸之一毁掉了。2007 年一个调查表明，维港 60%的岸线都被快速车道和普通车道占据，9.5%在开发建设中，只有 30.5%是市民可以步行通达的。(“What is on Hong Kong’s harbor?” by Wilbur Smith Associates：http://www.harbourbusinessforum.com/download/Harbour%20Audit%20Summary%20Report%20080121.pdf）而这所谓的可达，很多是极不舒适的可达，逼使行人们像老鼠一样，钻地道，爬天桥，没一点尊严。

“巨构”开发对步行的破坏

香港又是个房地产商主导的城市。在很多房地产商眼中，地面-地皮的商业价值，而不是公共空间价值，才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曼哈顿是适宜步行城市的典范，其成功的诀窍之一在于严格控制街区尺寸。一个曼哈顿典型街区（street block）的尺寸是 80x274m，周边围绕的是公共街道。曼哈顿在过去上也有失控的个案，但现在规划法规严格规定所有开发都必须局限在单个街区内部进行。即使一个开发商同时购买了多个街区，他也没有权力修一整栋超大楼盘，把穿越多个街区的公共街道网吸纳到他的私有建筑内部。这从根本上保护了曼哈顿街道公共空间的畅通，行人的权益和城市室外环境的品质。

而香港的城市规划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填海新地块上，不控制街道网的尺寸和商业楼盘的占地规模，鼓励开放商购得的地盘尺寸越来越大，修建的楼盘越来越大，对地面的侵吞越来越嚣张。近三十年来在香港涌现了众多“超级巨构”（mega-structures），几乎都采用“podium + tower”的模式：用一整栋巨型商场作裙楼（podium），最大化地占据地面，把本来应属于城市的室外公共空间一并吞食到商场室内，在裙房屋顶设置些所谓返还城市的“公共空间”，然后在上空修林立的超高层塔楼（tower）。街上的行人要穿越这些“巨构”，通常没有选择，只能被吸纳到商场里。而开发商吞并地面后，按照法规在裙楼屋顶上给城市补偿的“公共空间”，又经常让公众难以企及，实际上多为空中超高层住户和用户专用。城市规划的失控与“超级巨构”开发模式的犯滥直接导致香港大片地面丧失，彻底转为室内化、私有化。

西九龙的联合广场便是个典型例子。我的一位朋友从纽约飞到香港机场，乘机场快线到九龙机铁站，再乘电梯到联合广场空中的 W Hotel。请注意，他这一路接近二十多个小时，都在室内环境，他踩到的地面全是人工架空或机械运动的地面，铺着花岗石、地毯和金属。他没有一刻是踏到室外一小块地面的。第二天早上，他受不了了，说：“Gosh, I really want to see HK, with my feet on ground!” 他问 W Hotel 的服务员：“Where can I get to the ground?” 回答：“Ground? You wanna take a taxi? You can do it here - in the sky lobby.” 他到处问，摸索，花了十几分钟终于找到了联合广场（圆方）的地面——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多么无聊的步行环境！约 13 公顷的地盘被裙楼全部占据。你在地面上环绕裙楼走一圈看看，近 1.6 公里的距离，没有一个小店向街道开放，没有一条能让你穿行的公共街道。全是车库出入口、排烟机口、走火通道，加上圆方商场和九龙机铁站的门厅。我朋友放弃了，forget it, 进圆方吧，于是他就迷失在圆方里面的金木水火土购物迷魂阵中。每次我去联合广场，都深深困惑：这开放商和建筑师怎么会如此变态，对人在地面上行走有这么大的仇恨？

在香港，这样的“巨构”越来越多，越来越恶劣。大家再看看观塘市中心重建项目：它占地 5.3 公顷，号称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区重建项目，由政府市区重建局联合开放商建设。请注意，与西九龙联合广场不同，观塘重建根本不是填海新区项目，而是城市旧区重建。市区重建局居然利用改划，彻底废弃旧区已有的街道格局，套用填海新区项目的恶劣模式，修一个 Podium + Tower 的“巨构 ”。它的商场，盘踞了绝大部分地盘，把现有的近十条公共街道都吃到商场内部。其中最着名的街道裕民坊（Yue Man Square），连着一个社区公园、富于历史价值的银都戏院和很多有特色的小商舖，是观塘市中心无比珍贵的公共空间。可重建计划中裕民坊被完全吞吃到商场里面，成为室内购物廊，小公园则成了商场内庭园中的一个绿化摆设。我们知道，大多数关于重建的抗争是私人业主向开发商争取个人赔偿费的抗争，但我想问一下：那些属于市民集体的公共空间——街道、公园、广



场被侵吞，失去的利益该如何计算，如何补偿？香港市民如何能与这种野蛮的侵吞行为抗争？

照这样的趋势，将来香港整个城区会不会就建成一个超大的、完全室内化的私有商场？我一个在科大教书的朋友，前几年买了套住宅。我第一次去拜访时，很震惊：这楼盘的门厅直接连着港铁终点站。黑乎乎的地铁站里，判断不出是地面层还是地下室，反正进入那个楼盘门厅，坐手扶梯就可直上裙楼屋顶，找到单元门厅再坐电梯，不经室外空间过渡，就到空中的家里。我对朋友说你该转到城市大学教书啊。这样你每天可以从家里出门，下到地下室，直接上港铁，到九龙塘下车，在又一城商场里，几乎不经室外空间过渡，就一下子进到城市大学的楼里面。这样你可以一年 365 天，不用接触室外，不会踏到真正的地面。

这会给我们香港人带来什么影响？

第一，在生理和心理上，我们会变种的。我们会变成不会“脚踏实地”的人，一种只习惯踩在抛光花岗石地板上，在室内煲着冷气，在商场里窜来窜去的动物。

在中国，第一条通往西藏的高速公路修好后，正在迁徙中的藏羚羊要穿越它。它们第一次踏到水泥路面时，一下子呆在那里，长时间不敢移动，因为它们的脚，常年习惯了踩在石头、泥土、草皮这些质感丰富的地面上。它们从来没踩到过这么均质、平整的混凝土地面。它们的整个迁徙路线被被人工地面切断了——多可怜！可是，想想我们自己吧，我们与它们情况完全相反，却同样可怜：我们太习惯踩花岗石、混凝土地板，正在失去踩自然地面的机会和能力。

我小女儿在香港出生，大部分时间在港岛活动。她两三岁时，害怕各种自然地面。我带她去草地，我说你看这草多漂亮，上去走走吧。我抱她过去，她狂叫 No，把脚缩起来，不敢放到草上。我带她去沙滩，踩踩沙子吧，又是 No！我的天，这就是在市区商场里成长的香港儿童吗？心理分析师总喜欢考察一个人在童年时与人的互动对这个人的成长心理造成什么影响。可是，他们难道不得考察一下：我们的孩子在市区里都踩不到真正的地面了，这会对他们的心理、生理造成什么影响？

第二，在社会意义上，我们会彻底失去公共政治生活的基地，我们会变成“非政治”的人。

也许带全家远离市中心居住可以缓和第一个问题，但我们无法以一己之力应对这第二个问题：市中心地面的丧失导致公共政治生活的败落。

政治不光联系无形的（intangible）力量、价值和条款，也与有形的(tangible)城市空间密切相关。Politics 源于古希腊语，指“关于城市、市民的事务”。这些事务在什么地方

发生？在城市，在市中心。Politics 的词根是 Polis，意思是：城市、市民（公民）、城邦。希腊城邦 Polis 的中心区叫 Agora，市场、集市的意思，市民们可以聚集，展开各种公共活动的地方。这样的市区公共空间在古罗马叫 forum——论坛，同样是罗马共和国公共政治的基地。中国传统中也许没有这么明晰的关于共和政治-公共空间的定义，但汉语“城市”包含“城”和“市”两个字。后者“市”——市场、集市，及其衍生出来的庙会、茶楼、戏院等，就是前者“城”的核心公共空间形式。着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对北宋汴梁城中以街市为主的城市公共空间的生动描绘。总之，在欧洲共和传统中，在中国公共性高扬的历史年代里，政治源于城市，公共政治生活有赖于市中心公共空间的支持。

跳到二十世纪和今天：现代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为人们远程交流越来越提供方便，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削弱公共政治与实体性公共空间之间的密切关系。1963 年簇拥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广场上倾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的市民，1968 年涌上巴黎街头抗争的市民，1989 年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市民，2011 年占领开罗解放广场推翻极权的市民……他们比谁都清楚市中心的公共空间是建构公共政治和开展集体行动的基础。

香港市民也有同样的经验：我们在 1989 年一起走到街头声援北京的民主运动，我们在 2003 年走出来反“二十三条”，我们在 2012 年占领政总反国教，等等。这一次次抗争，不光通过集体力量，表达了我们的民主诉求，也一次次地“身体力行”地实践了我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利：我们就是要靠行走、聚集、占领，夺回本来就该属于我们的公共空间。

在今天的香港，官商联手，正在全面摧毁城市的公共空间。如前所述，他们将市中区的大部分地面，要么让车行交通占据，要么纳入私有商场。他们在那些彻底脱离地面的商场、隧道、天桥中设置的所谓“公共空间”，大部分仅仅是驱动消极“人流”的通道——人们一旦被吸纳进去，要么只能停下来购物，要么像鼠群般匆忙地穿过通道，无法积极地体验、聚集、交流、互动，根本无从谈起构筑起任何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政府对市中心仅剩的一点点室外地面，还以各种禁令，百般控制，限制公众的使用。比如这耗巨资、填海修出来政总巨门前的开放空间，本应是最适合表达民意的地方。但政府的严苛管制只允许示威者在几块孤立的、巴掌大的地方停留，以遏制他们大规模聚集的可能。“门常开” 可悲地沦落为视觉上、象徵性的“开放”。官商联手，不光大肆侵吞市区地面的商业利益，更从根本上摧毁香港公共政治的空间基础。如果通过现有的民意表达管道，根本无法遏制这种趋势，公民们有权通过更有力的抗争，保护、重建这空间基础。

“占领中环”，在我看来，是香港抗争史上最激发空间想像力的运动。它所提出的抗争模式，直接、有力地将香港的两套核心价值连接起来：无形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等价值；有形的——市中区地面公共空间的价值。不管“占中”在十月份的结果如何，我深信它会有更长远的影响。它会不会催生出一场长期、全面的“启蒙运动”，鼓励市民们广泛参与，积极讨论和行动，既能让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真正深入人心，又能激发起大家对公共空间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各种社会、空间抗争运动中，最终我们得以重筑香港社会，重筑城市空间？

2014 年 9 月 25 日于添马政总前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2】

黎隽维：政治总部的小学鸡空间政治学

主场博客作者

“

政府将权力以围栏的方式实物化，示威的活动就容易因为对围栏的对抗而陷于不义，呈现出暴力的形象。这样的政治手段，就如小学生的游戏一样原始和无聊。

”

最近政府于添马舰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加设围栏，令本来门常开的设计构思变成门常关。这实在令我想起小时候在小学的班房里的日子：小学生的书桌都是两张拼凑在一起的。那时我们都用间尺、书簿为界，竖立于两张书桌中间，好像围栏一样分隔开自己和同学的“领土”。这是一种以空间为媒体的的政治行为。如果对方过界，小学生就会向老师告发。同样地，政府总部突然设立围栏，就是要订立界线，製造自己的“领土”，具体化政府和反对者的敌我矛盾，从而合法化打击越界者的行动。

空间本来并无界线，人类透过订立界线来申明对界线内的空间的拥有权和统治权。在古今中外，都有无数这种空间政治学的例子。十七世纪西班牙人开始殖民美洲大陆。当时美洲的土着并没有领土的概念，经常和西班牙的移民发生冲突。于 16 世纪西班牙国王颁布《Laws of the Indies》，作为给殖民地总督的指引。西班牙人殖民到美洲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开采属地的资源。因此他们会尽可能避免跟土着发生冲突，以免影响日常生产。而其中的一个办法，就是建立领土的内、外概念：凡领土之内土着皆不可犯。于《Laws of the Indies》 里面提到，殖民者可以把房子建筑于领地的界线上，透过把抽象的界线实在化，向土着申明自己对领地的拥有权和使用权。慢慢地将领土的概念灌输给土着，从而合法化自己的占领行为。透过将建筑建立在界线上而把界线实在化的行为，实际上就把一个整体分隔为“你-我”、“内-外”、“敌-友”等对立面的政治行为，为侵略的行为製造一个法理基础，合法化自己的入侵。

自有城市的概念以来，就有城墙的出现。古希腊城邦经常互相交战，坚固的城墙自然必需。希腊式民主倚靠奴隶制度，而且只有成年的雅典男性才有公民权。而公民是要服兵役



的。例如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曾经三次出征打仗。希腊城邦是十分内向的社会，外地人在城邦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属于跟奴隶同一阶级的 Metics。经济上亦依赖奴隶的劳动力。因此城墙除了有保护城市的用途外，亦包含了一个社会模式和阶级观念，城邦以外的地方，公民权就会丧失，并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古希腊雅典城邦，除了倚靠奴隶的劳动力去支持生产之外，其所谓民主政府亦十分之腐败。而且她的民主制度是绝对民主，民众有权去审判和决定刑罚。例如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就因为被怀疑有亲斯巴达(Sparta)的政治取向而被迫喝毒酒自杀，罪名为 “对希腊的神明不敬”。可见古希腊的民主政制和现代以法治为基础的的公民社会概念是两回事。这些城邦政治的运作，完全依靠对地域介定界限的政治行为，集中资源来极大化劳动力的生产，以得出盈余来支撑城邦公民的生活所需。同样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城墙是绝对的空间，城邦的人口有上限 (5040 名公民，另包括大概 15,000 名非公民)，城池不能扩张和向外发展，否则就会带来战争和侵略的欲望。这样的界限是双向的，意味着界限以外仍然存在着俗世的欲望，而城墙则是将俗世排除于理想国之外的工具。某程度上她是极权主义国家，生活方式没有选择，靠单一化来保持城市的和平。

后来到西罗马帝国没落之后，中世纪城市亦有同样的城墙。然而，中世纪城墙并没有限制城市的向外扩展。很多大城市例如巴黎，伦敦等，城市肌理很快就超越城墙的范围，一圈圈的形成一个以教堂、或庄园等统治地方的权力中心为核心的城市结构。中世纪城市土地的拥有权全属于庄园的主人或君主等统治阶级，农民可以在君主的授权下耕作，而所得收成的部分要作为税款和租金向土地的拥有人支付。在中世纪的英国，威廉一世打败哈罗德二世之后，取得英国的控制权。于 1085 年期间制作一本名为《Domesday Book》的纪录册，详细纪录每片土地的人口，资源，价值等资料，计算和列明农民向皇室所要缴纳的税款。由于税收直接向皇室缴交，威廉一世亦藉此避免诸侯因税收而富有起来并组织私人武装对抗皇室。所有中央集权制度都牵涉平民和统治阶级因为资源分配和特权所产生的对立。因此，权力机构都有必要筑起围墙，保护统治阶级的安全。围墙因此代表了领土以内阶级对立的存在。根据哲学家福柯的研究，这种权力结构于十七世纪开始发生了变化。领土的权力核心开始着重对人口的管理，透过保障领土内人口的生活来进行管治，而不是只靠武力的规训来建立权威以统治民众。权力的实体渐渐变成医院，学校，监狱等保障人口正常生活的机构。管治者透过这些机构来管理领土，就好像“全景监狱” (Panopticon)一样，民众被看不到的权力所管治。这样并不代表权力在社会消失，只是因为权力被分散成众多控制生命的机构和机制，社会开始透过既定的模式自我管理。统治的受主(subject)再不是个别的身体，而是整体和宏观的人口。傅柯将这种政治模式定名为“生命政治”。因为权力已经被分散和隐藏成管理人口的机构，平民和统治者的对立消失，城市因此而不再需要以围墙来分隔两者。



然而，这样的对立在香港的政府总部再次出现。政府架起围拦，除了将人民排除于外，还有透过行使排除的权力而建立权威的意图，将城市的一部份划分为独占的空间，宣示自身对此空间的控制权。政府将权力以围栏的方式实物化，示威的活动就容易因为对围栏的对抗而陷于不义，呈现出暴力的形象。这样的政治手段，就如小学生的游戏一样原始和无聊。人类社会用几百年来发展出没有必要分隔管治者和平民百姓的政治体制，我们的政府却只消一日就将此打回原形。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朱凯迪：
庶民政治系列——凉亭被拆，女王像长存



香港社会运动人士

“

民政局将凉亭拆毁后，换上一个面朝一方的帐幕，暗暗与特区令人窒息的政治契合。舞台死了，周围的公共空间也随之死亡。

”

香港人讲历史，主轴是英国人的管治和李嘉诚如何发迹；香港人谈保存旧建筑，主要的标准是“靓”，而所谓“靓”，无非是精雕细琢的欧式古典建筑。皇后码头争论最刺激的地方，正是让市民看清楚，政府拿什么标准来讲香港历史和古迹价值，也让市民思考，我们是否要继续糊里糊涂地替这套历史观和保育观背书。今期星期日明报提到公园，就让我从维多利亚公园的故事说起，看看政府这套历史观留下了什么，又消灭和排斥了什么。

维多利亚公园是葛量洪任港督时（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七）其中一项公共建设。在其任内兴建的著名公共建设似乎特别多，包括皇仁书院铜锣湾新校、政府合署东翼、扫杆埔政府大球场等，另外，中区和铜锣湾的新填海用地罕有地没有商业发展，前者盖起了大会堂、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建筑群，后者则成了二战后最大的公园。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战后港英政府面对庞大的移民人口及中共提早收回香港的威胁，不得不改变战前的种族区隔统治，加强向华人提供公共服务。

维园开放五十二年来，有两个无人不识的地标。第一个是一九五五年五月置于公园内的维多利亚女王像，此像见证了港英殖民政府二十世纪首五十年的高潮低潮，它从中环流落日本再回来铜锣湾的经过，网上一查就知道。在历史档案馆翻看兴建公园前后的公文往来，当中绝少讨论应该提供什么设施给市民，却有很详细的关于公园命名（叫维多利亚公园、伊利莎伯公园或佐治六世公园？）和安放女王像位置的考量，而激起最多争论的竟然是女王像的基座高度。应该高三尺六吋还是七尺？最后殖民政府宁愿多花三千大元选择了七尺高的基座，以防女王被“非礼”（be subjected to indignity）。大家肯定已想起了一九九六年的潘星磊。

古物古迹办事处在建议前民政局长何志平不要列皇后码头为法定古迹时指出：“在考虑一座历史建筑物应否宣布为古迹以便重构香港的殖民地施政历史时，我们必须考虑全盘因素

（ we have adopted a holistic approach ），包括有关的建筑物与殖民地施政的关系，以及其对殖民地经济、宗教、教育、医疗发展等范畴的贡献。从这广泛的历史角度来看，皇后码头作为一个用作举行特别仪式的地方，其历史意义相对不大。”观乎目前被列为古迹的建筑——前港督府、前中区警署建筑群、前中央裁判司署、旧三军司令官邸、旧最高法院等，或者古迹办视为较皇后码头重要的一级历史建筑——旧域多利军营、旧鲤鱼门军营和旧南九龙裁判署等，政府以旧建筑重构殖民地施政历史的进路，只是单向地展示殖民地统治者在各方面的辉煌，不单止是要够权威（ 军、政和司法机构 ），连建筑风格也偏好着重展示阶级优势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轻视强调阶级平等的战后现代主义建筑。

维多利亚女王像虽然不是建筑物，但香港的古迹保存部门大概会把它归入上述的重构里，而以女王像为核心的维多利亚公园在这套历史观中，就是战后英国殖民者改善施政的德行之一，就是港府庆祝英女皇寿辰的阅兵场地（ 一九七三年 ），甚至是香港顺利过渡、北京兑现五十年不变承诺的象徵。因此，维多利亚公园内什么都可以改、什么都可以拆，唯独维多利亚女王像不能碰，世世代代供市民瞻仰和藉其回溯香港曾经有过的“欧陆情怀”。

公园内另一个地标是被称为“维园凉亭”的“中央音乐亭”（ Central Musical Pavilion ）。那是一个跟皇后码头一样“无甚特色”（ 何志平语 ）的现代建筑，政府档案里没有记载设计者是谁，甚至很难确认在何年兴建（ 笔者只在一项演唱会公告中，得知凉亭在一九六八年已经存在，也在一幅一九七一年拍的照片首次得见其身影 ）。但是，这个一直被官方轻视的凉亭，由一九七一年开始就成了我城居民站出来反抗强权、争取自主的基地（ 与毗邻皇后码头的爱丁堡广场分庭抗礼 ）。我从多种香港大事年表中辑录出以“维园凉亭”为中心的重要抗争，几乎就是一本香港社会运动史：

●一九七一年七月七日，数千学生和市民参加保钓集会，遭由警司威利率领的警队以长棍镇压，多人受伤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六日，各界举行“贪污有罪、集会无罪”示威，抗议警方票控参加“反贪污、捉葛柏”集会人士

●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每日战讯”等五个团体发起五月五日维园示威，抗议通货膨胀及失业恶化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万多人示威反对政府关闭金喜中学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日，佳艺电视台职艺员在维园举行佳视事件民众集会，争取复台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三万多市民集会反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篡改侵华历史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八日，五千多人集会要求政府遏止加价风



●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一万人参加民主政制大会，争取一九八八年直选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逾四万名香港市民冒着八号风球到维园集会，声援北京学运

（最后当然要包括一九八零年四月开始的城市论坛）

这段从市民抗争出发，以凉亭为核心的维多利亚公园史，是殖民政府以至特区政府古迹保存部门容纳不了，甚至要刻意扫除的。这当然并不稀奇。稀奇的是，就算从这些抗争中一路走来的香港市民，也似乎对盛载这些抗争的公共空间和地标无知无觉，甚至被动地认同了官方的历史观，认为这段“集体回忆”不值得成为我城历史的重要篇章，不值得成为我城下一代成长的路标。于是，在市民的默许下，二零零零年，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进行“维多利亚公园改善工程”。民政局在文件的一处提到维园凉亭：“公园内的其他设施，如厕所和更衣室、经铺筑的地面、座椅和长櫈、避雨停和凉亭等亦已残破，须以设计较佳的设施替换。”当时，一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记者问到有关工程时，只说希望政府在局部封闭维园进行工程的时候，不要缩减六四烛光晚会的场地面积。

“维园凉亭”就此消失。凉亭消失后，周围的空地几乎再没有举行过像样的抗争。为什么呢？因为，本来面朝八方的圆形凉亭是非常理想的动员舞台（是西人建筑师有意为之？），运动组织者（就算没钱在足球场搭台）只需拿着大声公振臂一呼，马上就能吸引四面市民的注意。民政局将凉亭拆毁后，换上一个面朝一方的帐幕（下图），暗暗与特区令人窒息的政治契合。舞台死了，周围的公共空间也随之死亡。

皇后码头不也是一样吗？皇后码头拆毁后，毗邻的爱丁堡广场将会兴建四十米长的 P2 路，随之消失的，是四十年市民抗争的空间凭据。

凉亭被拆，女王像长存；码头被拆，港督府长存。零三七一穿着黑衣缔造历史的同志啊，你们真的要替这样的历史观和古迹观背书吗？保育运动就是民主运动啊！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推荐阅读：黄守仁：西洋菜慢火滚八楼与我

“在街上播片对比我今天 upload 一条片上 youtube 的感觉实在相差太远！出来的效果甚至是正正相反，因为街道、影片和行人都是互相裸露于对方的，当你看到喧哗躁动时停留，或听到被压迫者低诉时就转身……当影片回到网上，一切都太容易变成无关痛痒了。”

原文链接：http://jintian.net/207/d9.html



马国明：小贩：拉阔香港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香港文化人、专栏作家、商人

“

无论是公屋或私人屋苑，人们开拓“感知空间”的可能已荡然无存。政府向地产商放宽地积比率交换得来的所谓公共空间，部份根本不能向公众开放（如港湾豪庭）；即使开放也是诸多规管，而且往往由大财团来规管（如时代广场）。

”

由“88 直选”开始，香港的民主运动便聚焦在立法会和特首选举双普选的议题上；泛民阵营中除了双普选、平反六四和反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三条议题意见一致，并且跟建制派壁垒分明之外，便再没有其他议题能够突显民主派的主张。香港的民主运动除了遗传了殖民年代的骨质疏松症之外，在九七后更患上偏食症，变成一个单一议题的运动，可谓营养不良。双普选又可以被看成是香港民主运动的太阳，而泛民这一极之松散的民主联盟则一直环绕着双普选这个红太阳而转。在泛民中，民主党的实力最雄厚，可以说是泛民的木星。政改一役中，民主党突然在一夜间不但放弃了 2012 双普选的竞选承诺，连普选定义和普选路线图也放弃了，只提出一个改良版的区议会方案。曾经投票支持民主党的选民固然十分愤怒，感到被出卖；所有期望香港最终能达至双普选的人除了错愕、难以置信之外，更会感到苦闷和鬱结，因为民主党的做法有如木星突然脱离了太阳系，木星固然不知去向，太阳系原有的“万有引力”亦即时瓦解。但如果了解到香港民主运动既患了先天性骨质疏松和后天营养不良的症状，民主党的妥协在分析层次上其实有迹可寻。民主党既然认为群众运动不管用，要达到双普选唯有乞求北京恩赐。既然是恩赐，便不能讨价还价，那怕北京作出些微的让步也要立即下跪，叩头谢恩。不过责骂民主党于事无补，如果九七后民主运动患上营养不良症状的诊断正确，那么现在须要做的便是马上补充营养。在那个传闻中人人毫无怨言，逆境自强，只有正能量，没有负能量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街头随处见到大排档和卖熟食的流动小贩；在那个年代只须像电影《花样年华》的女主角张曼玉那样，拿着一个锑壶走到街上便能补充营养。今日大排档所余无几，食环处对熟食小贩采取零容忍，街上已不可能见到熟食小贩；但要替营养不良的香港民主运动补充营养却必须召唤被赶绝的小贩重返香港的街头，而原因至少有五大点。



小贩是抗衡地产霸权的正义朋友

地产霸权对社会的伤害罄竹难书（幸好刚出版了《地产霸权》一书），但这些年来泛民各团体除了偶尔在立法会上提出质询，对地产霸权一筹莫展、无计可施。虽然小贩是社会的弱势社群，小贩的灵活经营却可以避开地产霸权的掣肘。正如安徒在〈“中年危机”论政改〉所说，如果这一刻的民主运动有两条路线，那么一条是“促进社会权力均衡的民主”，另一条则是“巩固政权管治认受性为首要目的的民主”（《明报》2010 年 7 月 11 日）。安徒十分厚道，没有指名道姓说什么人属第二条路线，但留意近日事态的读者必定可以自行判断，倒是“促进社会权力均衡的民主”在实践上除了普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普选之路原本已是关卡重重，现在民主党竟然和当权者携手，失惊无神推出一个不明不白的区议会改良方案，普选之路更加难走。不过普选无非是为了“促进社会权力均衡”，这些年来，小贩一直在泛民眼前，但却对各种打压小贩的措施无动于中。小贩是弱势社群，却有能力跟地产霸权周旋；成功抗衡地产霸权是“促进社会权力均衡”的一大步，小贩正好是抗衡地产霸权的正义朋友。香港的大地产商在特首选举和功能团体选举足轻重，普选一旦落实自可削弱地产商的影响力；但卑微的小贩一样可以运用灵活的游击战，令地产商坐立不安。去年便发生地产商向法庭申请禁制令，禁制个别小贩进入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范围。虽然事件结果如何，未有见到报章报导，但已足以说明卑微的小贩其实拥有极大的能耐，连大地产商也徒呼奈何。小贩抗衡地产霸权的能耐绝不稀奇，也不神秘，但意义重大。这些年来，泛民一直忽视小贩这群抗衡地产霸权的正义朋友，是因为不明当中的重大意义，这也是小贩足以为香港民主运动补充营养的另一原因。

小贩是开拓城市空间的开垦者

小贩抗衡地产霸权的能耐无非来自求生的意志，小贩的求生方式是凭着自己的眼光判断城市空间里有什么地方适合自己发挥一己之所长。小贩的眼光不一定对，但判断对的便能在城市的一隅立足。最早的城市研究者把城市看成是一种生态系统，虽然这是一种甚为粗糙的见解，但以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小贩开拓城市空间的作用却甚有启发。生态学认为在某生态系统里，个别物种的作用至为关键；小贩恰好是这种关键物种。深水埗鸭寮街曾经有很多地摊，除了买卖二手电器和电子零件的，还有一些是买卖古玩和精品的。不少收藏古玩和精品的人士定期到鸭寮街，虽然不一定买到心头好，但到鸭寮街逛逛已是生活的习惯。他们知道很多像他们那样的业余收藏家，百年归老之后，家人大多将那些收藏品整批拿到鸭寮街卖给地摊的小贩。没有小贩便没有古玩买卖的中介者，当然香港不会缺少经营古玩买卖的商人，但鸭寮街这种充满庶民色彩的城市空间却全靠一些小贩，凭他们自己的眼光正确地判断鸭寮街可以让他们摆设地摊，买卖古玩和精品。同样，大笪地、女人街等



城市空间全是由小贩开拓的。小贩是弱势社群，又是政府花大笔公帑供养的小贩扫荡队扫荡的对象，但小贩其实是开拓城市空间的开垦者。这些年来泛民一直忽视小贩，问题不只是忽视弱势社群，更是忽视了小贩开拓城市空间牵涉的空间政治。由民主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一直跟空间政治沾不上边，恰好在九七之后城市空间政治是地产霸权的主要的战场，由重建到强拍；由“公共空间”的争议到“活化历史建筑物”和“活化工厦”的措施都关乎空间政治，也关乎“明益地产商”的利益输送，但过去十多年里，香港的民主运动却完全没有触及空间政治，只是独沽一味争取双普选。普选当然要争取，但未有普选不表示要“桥埋双手”，投闲置散；未有普选正好让地产霸权发动全面的空间政治，不但小贩遭殃，连所有市民都举步维艰。“公共空间”原来毫无公共性，只可以进行一些“断估唔会拉”的活动；“历史建筑物”活化即私有化；重建的结果是“士绅化”，升斗市民无法在市区立足。香港的民主运动却完全未能介入，反观卑微的小贩却敢于跟地产商周旋在底，这是卑微的小贩已足以为民主运动补充营养的另一原因。

小贩带领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间”

以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三元论作分析，小贩所开拓的城市空间属“感知空间”，是由生活于城市的人在日常生活的过程里缔造的。换言之，市民大众亦同样可以开拓城市的“感知空间”，不是只有小贩才享有这项殊荣。事实上，在五、六、七十年代的城市布局中，市民大众便是以自己开拓的“感知空间”把政府官员坐在冷气房间里构思出来的“构思空间”转化成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以下是一位石峡尾七层徙置大厦居民的一段描述：

当年七层高徙置大厦，单位内都不设厨房和厕所，居民要洗衫或清洁梳洗，就要到设在各楼层两座相连的中间位置，供居民使用的公众洗衣房（又叫水喉脚）、厕所和浴室进行。而每家每户为方便煮食，都会到石硖尾工厂大厦的山寨，厂购买一个以锌铁板组合而成，高度、濶度和深度都恰到好处，可容纳两个火水炉的煮食炉，放置在家门外铁窗前的走廊空间当厨房作煮食之用，解决一日三餐需要；炉枱底部，更是一个小小厨柜，用作摆放煮食用具，设计充满民间智慧。

那个年头，洗衣机还未盛行，大家必定趁早上的时间，赶快到水喉脚洗衣，因为只要有邻居在洗衫，大家都会互相帮忙，而那个时间，亦是各家各户交流消息的好时机。那个师奶嫁女，那个叔叔娶老婆，那家安装了电话、电视，飞机榄去了那里等重大消息，都会从洗衫时间中互通发放，我也会从成年人口中收料，了解飞机榄动向，好让晚间有话题跟其他小朋友吹嘘。邻舍互相帮忙、守望相助，是那个年代的社会特徵。而这亦正是 Henri



Lefebvre 所指的 Spatial Practice。洗衫后，大家又会各自用胶桶盛水回家准备煮午饭，忙得不可开交。

早上的家务时间过后，黄昏又是大家各有各忙的时候，家家户户都同一时间开炉煮饭，饭香餸香飘散每一个角落，万一邻家的叔叔加班而来不及煮饭，也会来我家食"游击饭"，妈妈好，总不会难为人家，加双筷、多隻碗就一起食饭，从不计较，也从不要求人家交伙食费，有时人太多，又会主动到烧味档斩料，姐姐们的同学有样学样老远由九龙仔走来我家一起食"游击饭"，结果一餐饭十几二十人一齐食也是经常发生的事，由于斗室地方小，大家夹了餸就会自动自觉走出门口食，青菜白饭送万家灯火，是当年徒置区的奇观。那个年头，虽然大家同样活在贫苦当中，但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是我们那年代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的相处方式。

晚饭过后，才不过七点，大伙儿都会由家中拿出帆布床，或那张六七十年代最盛行的摺合尼龙床到横骑楼抖凉，准备晚上睡觉之用，由于这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所以从来也没有出现争位的情况，偶然地方不足，隔离邻舍也不会为此吵闹，只会互相借位，为的只求和和气气，令辛劳的一天可换来一晚安睡，抖擞精神后再迎接新的一天。（潘麒智，〈停泊在小巷的回忆——飞机榄伴我们走过的七十年代〉，《文化研究@岭南》19 期 2010 年 7 月）

石峡尾的七层徒置大厦是以英国监狱为蓝本建成的，居住环境绝不理想，但当年的居民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以他们的空间实践把不理想的环境渐渐转化为适合人们居住的居所。单位没有厨房，家家户户便在门外的走廊设置炉灶煮食；单位没有厕所，不能洗衫，每位主妇便到"水喉脚"洗衫；单位狭窄，又闷热，人们便到走廊转角较宽敞的地方打开帆布牀或尼龙牀睡觉，总而言之是以自己眼光和判断令生活好过。走廊当然是公共通道，当年的居民在走廊煮食、摆放帆布牀或尼龙牀睡觉和到"水喉脚"洗衫按理是阻塞通道，但却无人干涉，连媒体也不屑揭发。当年七层徒置大厦的居民其实不是阻塞通道，而是扩潤走廊的用途，这也是公共空间应有的意义。公共空间当然是供公众使用，但公众的利益是多样的；像石峡尾的七层徒置大厦，公众不但须要以走廊作通道，更要用来煮食、洗衫和睡觉。公共空间应有的意义是让公众参与其中，丰富其用途，公众不应是被动的使用，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当年七层徒置大厦的居民恰好发挥了参与者的角色，他们以自己的眼光和判断扩大走廊的走途，亦因而使构思上参照英国监狱设计的"构思空间"转为适合市民居住的"感知空间"。

今日的公屋，家家户户都设有厨房和厕所，私人屋苑更往往包装成豪宅般。这些都足以成为时代进步的标记，但这种进步的代价是公共空间萎缩。在设计上，今日的公屋远胜当年的七层徒置大厦，但屋邨里的公共空间全都有严格的规管，绝不容许人们在走廊煮食、睡觉或洗衫，就连利用栏杆晾晒被褥也不准，理由是有碍观瞻。屋邨是人们生活的居所，晾

晒被褥跟煮食、洗衫都是生活所需。五、六十年代经常被形容是“狮子山下”的年代，人人逆境自强，毫无怨言；而今日人们轻易责怪政府，更动辄上街抗议，用名导演的讲法则是“只有负能量”。摆在眼前的是直至七十年代，七层徒置大厦的居民仍可以在走廊煮食和睡觉，在“水喉脚”洗衫；今日连在栏杆晾晒被褥也不准。直至七十年代，公屋居民仍可以参与改造身处的公共空间；今日公屋居民不过是被动的使用者，他们不能侵犯其他使用者的权利。其他使用者包括一些专诚到屋邨参观的游客或专诚到屋邨巡视的官员，为了这些人居民不得在栏杆晾晒被褥，免得有碍观瞻。今日，无论是公屋或私人屋苑，人们开拓“感知空间”的可能已荡然无存。政府向地产商放宽地积比率交换得来的所谓公共空间，部份根本不能向公众开放（如港湾豪庭）；即使开放也是诸多规管，而且往往由大财团来规管（如时代广场）。由康文署管理的公园，一入门口便是大块标志，列明十多项不准；唯一欠缺的是没有职员站岗派发传单，指示市民如何使用公园。今日的香港，“感知空间”完全被政府和大财团构思出来的“构思空间”盖过，在这种情况下，小贩开拓的城市空间成了硕果仅存的“感知空间”，小贩因此可以带领市民重塑城市的“感知空间”。

小贩突破市民的“中产想像”

提起小贩，很多人立即会想到阻塞通道、乱抛垃圾、不卫生，甚至如食环署的宣传那样“损害市容”。恰好是这种“中产想像”，当民主运动提出要恢复流动小贩发牌时，市民会譁然，民意会一面倒地反对。但群情汹涌的时候正好是教育和带领群众介入空间政治，抗衡地产霸权的契机。市民的“中产想像”其实就是地产霸权的一种表现，霸权(hegemony)又可译作统识。霸权说的不是土豪劣绅横行无忌的行径，霸权根本就是一套统识，要人们相信事情必然是这样或那样子，没有其他可能。地产霸权依恃的统识跟市民的“中产想像”异曲同工，互相呼应。当市民认定小贩“损害市容”时，小贩开拓的城市空间反而成了不堪入目的景观(eye sore)，政府高官和大财团的 CEO 关在冷气房里度桥构思出来的便是值得推崇的理想成市空间。九七之后，豪宅之类的楼宇越起越多，而且遍布港九新界，无远弗届，除了因为地产商财雄势大，更是因为市民的“中产价值”。当市民认定小贩“损害市容”时，也会认同地产商兴建的类豪宅就是他们心仪之选。这些年来，由民主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一直忽视空间政治，对地产霸权不断坐大置若罔闻，彻底暴露民主党吃六四老本和“为民请命”模式的严重局限。其实社会上早已有各路零星的人马介入空间政治，奋勇地抗衡地产霸权；另一方面市民对地产霸权早有怨言，却碍于上述“中产想像”，加入打压小贩的行列，变相帮助地产商除去唯一天敌。在政改中，民主党那种没有原则的妥协其实是抵受不了市民的“中产想像”，担心市民对民主运动会渐渐失去信心，必须立即挣



点成绩冲喜。民主党的妥协说明香港的民主运动必须突破市民的“中产想像”，小贩正好是突破“中产想像”，拉濶民主政治的最佳盟友。

小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

“有事揾民主党”这句口号是民主党为“迷债”苦主奔走时打出的旗帜，“迷债事件”是民主党“为民请命”的一次杰作，报章的政治耳语更猜测是否背后有高人指点。“为民请命”往往只能局限于某些黑白分明的议题上，小贩不但不是黑白分明的议题，而且更会冒犯了市民的“中产价值”。这些年来，民主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一直受制于市民那套跟地产霸权互相呼应的“中产价值”，忽视小贩，忽视壮大民主的力量必须致力促成某种跨阶级联盟。正如青年学者许煜在〈告别民主〉（《明报》2010 年 7 月 1 日）中指出，“民主”一词简化了 democracy 原有的意义，应该重新沿用“德先生”或“德莫拉克西”这一五四时的称号。许煜的主张非常有见地，民主者人民当家作主也；问题在于人民从来都不是一个利益一致、见解一致，没有任何差异、浑然天成、有统一意志的整体。另一面，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不是中国）之后，人民便被想像和被指令为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河蟹社会”和打压广州话是最新的措施。许煜提出“告别民主”，这里还要加上告别民主党那种自困于“为民请命”的政治运动模式。“为民请命”的前题是黑白分明，六四当然也是黑白分明；但“德莫拉克西”牵涉的是人民当中各种复杂的利益和主张，小贩体现的和一般市民的“中产价值”之间的巨大落差是一例。当前香港的民主运动的当急之务是要扭转市民那种跟地产霸权互相呼应的“中产价值”，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市民认识小贩对香港社会的贡献。CNN 日前“强力推荐”40 种香港地道美食（《苹果日报》2010 年 7 月 16 日），外国记者当然不会知道 40 种地道美食中，起码一半来自昔日街头的流动熟食小贩或大排档，称小贩是本土文化的生母一点也不夸张。无论如何，明年七一游行必须邀请小贩带备他们的生财工具列队游行。以后任何包围立法会的行动也可以邀请小贩摆档，顺便让从未曾光顾街边熟食小贩的八、九十后，一嚐现时位居要职的一班五十后当年随便走到街上花十元八块便能吃到的地道美食。

小贩以自己的眼光判断城市的那个角落适合摆卖原是拓展城市空间，扩濶空间用途的举动，跟石峡尾七层徒置大厦的居民在走廊煮食和睡觉并无分别。在走廊煮食和睡觉当然阻塞通道，但当年没有人介意和干涉居民“阻塞通道”；相反今日小贩在街上摆卖却被控“阻街”，而且必定被法庭判罚。当中的分别在于列斐伏尔和哈维等所说的“城市权利”(The Right to the City) 是否得以落实。(Davi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September/October 2008) 石峡尾七层徒置大厦的居民可以自行改造居住的空间，卖飞机榄的小贩亦可进入大厦贩卖；居民和小贩都参与塑造徒置大厦的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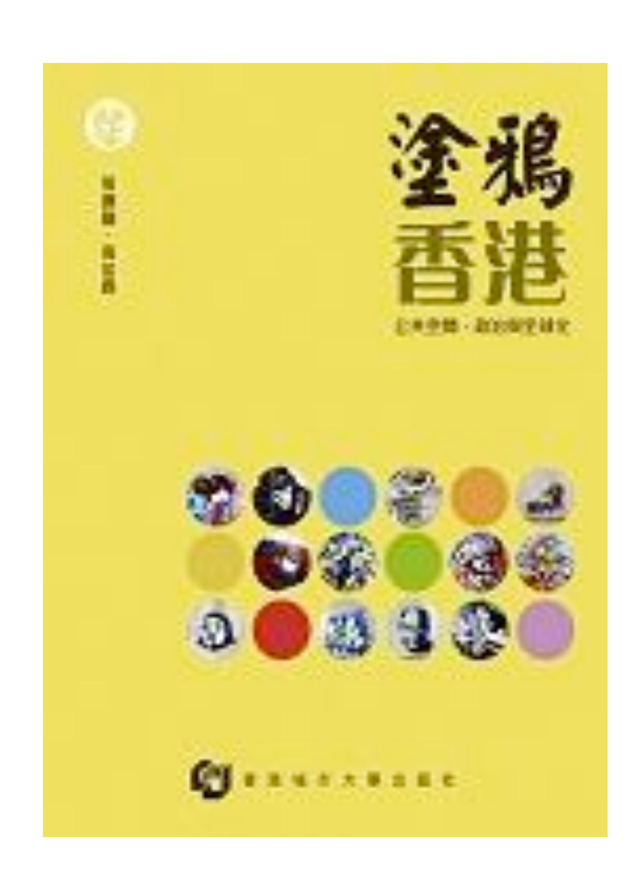
间。相反，今日地产霸权当道，政府和地产商垄断了城市的空间生产；打压小贩是因为小贩仍胆敢挑战政府和地产商的垄断。从这个角度来看，恢复流动小贩发牌不失为开启“城市权利”运动的出发点。香港是一个城市，香港的民主运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民主党那种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运作方式下，完全忽视城市空间政治和城市权利运动；今日，民主运动要重新出发，民主运动必须结合和倡议“城市权利”运动。

原文首发于独立媒体。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荐书】张赞国,高从霖：《涂鸦香港——公共空间、政治与全球化》



作者: 张赞国 / 高从霖

出版社: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简介：《涂鸦香港：公共空间、政治和全球化》从不同角度检视和批判香港涂鸦，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涂鸦，其实并非“涂抹诗书如老鸭”，而是香港多元社会的缩影。在公共空间的争夺中，涂鸦充满想像的共同记忆、民粹的霸道、个人与公权力的冲突、媒体的集体思维、本土和全球的融合、低成本艺术品及街头艺术家的使命。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3】

周思中：在解殖的街头



：香港独立媒体创办人之一

> **电光火石，保卫者眨眼间回到一种殖民情状：任何与土地和历史建立关系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拦截，人就像禁锢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设定的场域所支配，不得置喙。**

有说，“香港的回归过程历时只有一秒钟”。意思就是，历史上所有殖民地的解殖过程，全都经过长久而动态的发展过程，未到最后尘埃未定。反观香港，没有的翻箱倒笼的本土历史清算，没有前仆后继浪奔浪流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没有洗心革面的自主意识醒觉；回归过程就如今年年初的全城禁烟法例一样，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晚上十一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过后，香港在欢呼声和反对声中顺利过渡，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什么都没有发生，包括连“什么都没发生”的错愕都没有。

查早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当香港还未可摆脱亚洲金融风暴和九一一的余震时，今天行政长官，当天的政务司司长曾荫权，坐着一艘髹着“香港品牌”的天星小轮，风风光光由尖沙咀启航到中环，宣传“亚洲国际城市”这个所谓“香港品牌”。那时回归才四年，香港却像透一支倒楣的军队，还未誓师便给攻个七零八落。据说当时市面百废待举，香港人和管治阶层都坐同一条船、《狮子山下》式的假像，几乎骗到了全香港的市民。

几年过来，在网上搜寻 star ferry，即是天星小轮的英文名称，即便在如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时代周刊，不难找到关于香港特区政府如何因为填海修路，冒着大批香港市民的反对声音而坚持清拆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消息。当年还未当特首的曾荫权未知是否预视得到，区区一个拆码头的决定，竟然会牵动到香港人与自己土地的关系那一条似乎从未敏感过的神经，还有一大堆恐怕从未如此明晰而有说服力的解殖躁动。一个矩阵在运动中形成，公共空间、历史身分、管治关系等维度纵横交错；意识和身体，正大剌剌地逼近着由港英时代开始塑造的殖民性的禁区和底线。

换言之，姑勿论同样一片空间，更流行的讲法是英国皇室和港督等登岸的地标，但其自五十年代开始，已经与香港的平民百姓的生活绵密交织，绝对是不争的事实，也不容略过。一直被视为殖民管治象征的这片空间，竟阴差阳错始料不及地提供了一条线索，构成了回归十年始开始发生的解殖反思的大舞台。

***

推土机代表的是一种不惜一切的发展观，不顾历史不顾文化不顾社区关系地为了多建一两幢比天高的商场。这是我城之所以能够由上世纪一直经济冲天飞到今天的法宝，这件法宝的双生儿，就是自殖民地时代开始的一种殖民性。什么是殖民性呢？它把我们悬置在半空，拦截我们与历史、与地方的关联——地方只是通道而不是生活，历史只是包袱而不是诤言。悬在半空予人像雾像花的自由幻觉，这悬置启自一八四二年，至今纹风不动。初时它告诉我们，香港人是无（或者不需要）根的，后来索性以城市发展之名禁止一切令我们与地方和历史产生关系的条件。结果当然就是，香港人视自己为极端的单子，浮游在令人目炫的任君选择的“自由市场”；家庭已是最高层次的组织单位，集体行动和身份只是笑话。这，在回归之后未曾转变过。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发生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齐泽克引述过法国哲学家巴迪乌（Alain Badiou）的真理事件（Truth-Event）概念，真理事件指的是在正史的知识中难以名状和辨认的事件，它无法拼入已有的传统并成为其一部份，无以在现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中找到资源以论述。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即为真理事件的典型例子。真理事件是绝对的异类，回避、抗拒、否证事件发生时所可资引用的各种分析或解框架，它甚至进一步搞乱常态和个别事件的二份。真理事件不只是常态下出现的个别事件，不只是又一次的不着边际的骚动；相反，与现况与传统极端不协调的真理事件，披露了社会看似稳定的结构里的根本弱点。这弱点是社会结构的构成部份，社会所有制度和机器需要一直主动而低调处理的质性问题，大众也一直被告知和训练成对这根本问题感觉麻木，甚至不知不觉。

真理事件，虽然像个谜样的大爆发人人手足无措，唯它制造了属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按齐泽克的说法，真理事件的“真理”，是钩附在某个偶然而具体历史情状的真理。事件的主体各种原有观感和意识维度在真理事件中被暴烈地打乱，并重新收归在真理事件横空出生的新语境、感观和参照的维度上。主体与事件的关系，一语记之：忠诚。根据巴迪乌的定义，主体的出现是有限而偶然的：真理不仅不是“主观”（即并非由主体之游思妄想所决定），主体相反地需要服务穿透了他／她的真理；主体是命定地无法满足真理所提出的无止无终的要求，因此他／她只能在其身处的多重情状中，寻找真理的各种蛛丝马迹。

去年的天星运动如果有任何意义的话，意义就始于于抗争者登上推土机的一刻。



先简单交代一下天星皇后运动的背境。风眼中的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座落在港英政府于战后五十年代的那一期填海工程的新填地上。一向吃大海饭的香港，由殖民者登陆始已不停填海。为了增加可使用的面积而逃避向政府缴交差饷，开埠时位于岸边的仓库和贸易公司已不停进行小型填海工程。五十年代的填海工程，不仅填出了日后的维多利亚公园，还填了中环现在大会堂，皇后码头、爱丁堡广场、天星码头等那大片土地。我城一如各地其他大城市，寸金尺土，五十年代填海工程特别之处，便是填海所得的新填地，竟然没有地产商的份，不作建摩天大厦之用，而是成为文娱康乐消闲场所。而实际上，这片香港现在买少见少的沿海公共空间，闲日是上班族午膳和饭后散步、钓鱼下棋的地方，周末是飘洋过海到我城打工的外佣的欢聚天地喘息空间，遇事则是社运份子纠集群众昂首阔步游行到中环政商权贵总部的起点（六七年的反天星小轮加价、七十年代风风火火的中文运动、保钓、反战等游行示威，不少就是发生于这片海旁的公共空间）。

香港无止境的发展欲望，今天终于波及这片在城市心脏的公共空间。政府终于启动了中环第三期填海工程，因为无关痛痒的地下排水渠和硕大无朋的公路，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都面临清拆的命运。去年十二月中的一个中午，约二、三十人聚集于天星码头的工程围板外，希望阻止工程的发生。然而，工程并未如计划般受到影响，门外的人边聊胜于无地阻挡希望进入地盘的工程车，边听着地盘内推土机地把那近五十年的建筑逐寸逐寸地毁灭，一筹莫展。突然。午饭后的时间，有工程车要离开地盘，乘着地盘的大闸开启，一帮人伺机跑进地盘入口，有的与保安追逐，有的被包围。还有一个：他站上了隆隆作响的推土机之上——推土机被迫闩掣停止，而这也是占据，和真理事件的开始。

***

据本地报纸所载，闯入地盘后，关键点在于翌日，占据者被不合理地大规模的警力抬离地盘——当时我城的议会正在就天星码头清拆事宜，进行动议辩论。然而，不能不提的就是在随着登上推土机而揭幕的二十多小时占领时间。入黑前，保卫码头者几度被地盘的保安人员不熟练地抬走，唯被闯进的地盘已是不再一样的境界：它吸引你前仆后继再度闯进。因为它并非空谈的价值观争论，并非政府的决策闭门黑房，也不是要千方百计吸引媒体注意的 photo opportunity（见报机会）。地盘就是工程，阻止地盘运作就是阻止工程，也更无意中挑动了我城的人与土地、与历史、与管治关系等的无意识设定。这道理在那几闯几抬之际，最是鲜明最是深刻。地盘保安把保卫者抬走，就是一个“地盘（即再不作为公共空间的码头）属承建商的私人地方”的一个宣示，而政府的强硬态度，更是一则警告：官民之别，不得越过。

电光火石，保卫者眨眼间回到一种殖民情状：任何与土地和历史建立关系的意向，都被冷漠地拦截，人就像禁锢在半空任由管治者所设定的场域所支配，不得置喙。面临清拆的码



头，重复的清场，强硬的政府立场，披露了这个被称为后殖民地的殖民性秘密，亦将保卫码头的人士重置在一系列所有人都以为已不再的殖民坐标下。如此情况，在回归近十年的一个下午，既是全新的体验，亦为历史的重复。

几经波折，地盘保安和政府放弃了立即清场的念头。那一夜，保卫者都是光秃秃的暴露于一种管治之前，席地而睡，在地盘内、在推土机底，过了下着微雨的一夜。对于如笔者这种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人代初出生的香港人，八九民运还未懂事，九七回归只会以政治不正确的冷战思维看待；所谓社会或政治运动，要么就是纯论点上的唇枪舌剑，要么就是一色一样的大游行，要么就是议会内政治精英之间的勾心倾轧。这当然与主流媒体的理解能力和书写格式有关。但似是而非的印象，就是“人”若不是人头的总和，就是缺席：缺席于面临能够促成社会转变的关口，更严重的是缺席于能促成社会转变的对弈。而这难道又能与从报章所读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报导和论述脱得了钩吗？作为传播工具的报章和其他媒体，仿佛很“现实地”替你分析权在谁手，谁的计谋是如何，为什么得逞或成功。每天读这类报导或评论的读者，能想像自己终有一天能成为促成社会转变的一个角色吗？能够真切的体会，无中介地面对管治权力，同时所要承担的压力吗？这大概是社会人人轻轻省省无甚所谓浪奔浪流的特质的本体论基础。

天真也好浪漫也好疯了也好，当时保卫者的脑里想的很简单，占领尤如在大水坝中刺一个小洞，小洞支撑得越久，整幅水坝彻底瓦解的机会就越高。而相反，地盘失守就意味昙花一现照常营业——一度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可以争取的东西，是否紧握下去，成为了唯一的问题。

换个说法，面对政府蔑视历史、蔑视人民的公共空间，保卫者死守的，不仅是一座有五十年历史的钟楼，也是我城或者从来只是若隐若现的主体性的。放开了手，没有实质的损失，只是继续什么都没有发生。

随后的一个星期，天星码头的保卫者就如不是在码头里，便是守在码头的外围，继续带着阻止工程的目标，行使香港人在公众地方的权利。绝食、往特区行政长官的官邸抗议，不停被警察阻挠、不停的地抬走，不停的被驱赶。过程中，保卫者跌撞于街头之际，原本在城市中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的感觉逐渐变成难以承受的轻，一种对立于只希望把人民封锁在无根状态的殖民式管治的本土意识，亦开始在酝酿觉醒。

虽然天星码头的钟楼，最终在众目睽睽下整座被锯走，直往堆填区被磨成碎片；惟在天星码头保卫运动中被召唤的人，亦像被充了电的电池般，转战在天星右邻的皇后码头。保卫运动走到皇后码头的阶段，要求参与者更清醒地直面及回应我城的殖民经历。查皇后码头于一九五三年建成后，一直是由英国乘飞机抵港后，由九龙坐着其“慕莲夫人号”到中环登岸进行其就职仪式的地点。现在流行的讲法，皇后码头的设计与其对面的大会堂以一条



轴线遥相呼应；在这意义下，如果原本天星码头所象征的，还可以说战后像雾又像花的现代管治形象，保护皇后码头岂不是走历史的回头路，甘心将热情都奉献给殖民的始作俑者？

历史不能重置，也不能改写。若皇后码头的确曾有过标志殖民权力——登岸以宣示主权——的过往，除了发掘一直以来在皇后码头发生过的抵抗运动——中文运动、保钩、外佣争取权益运动——，码头保卫者亦努力在皇后码头的空间刻写与权贵无干的本土历史。自天星码头被拆毁后，皇后码头及其对开的广场，不断有文化活动在发生，计有：本土社会运动前辈的夜话、剧场游戏工作坊、文学沙龙、独立短片放映、诗歌朗诵及音乐会、关于历史文化保育的论坛、火锅聚餐、摄影展、导赏团、人民规划工作坊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早前三月台湾的汉生病疗养院“乐生院”因为捷运工程而面临清拆，一班关注的香港朋友亦于同仇敌忾的皇后码头进行过两次音乐会。除此之外，码头的保卫运动更开始与其他社区运动的团体连结，尝试以保护香港本土文化和庶民生活为主题，将抵抗同一发展至上逻辑的运动扩散和连结。

殖民情状的暴力，在于殖民者带者高傲自负的眼光，目空本地人的一切，纵然由萨依德《东方主义》始的后殖民批评发展了快三十年，理论所及，谁是殖民者谁是被殖者已开始难以界分，惟一种将土地的生活方式、历史、身份、贡献埋没和贬抑的主流意识，历史和地方只是与所有商品一样的消费心态，在香港仍是南征北讨百战百胜。码头保卫者在街头的一切，便是希望实践出一种别样的时空观念，同时在实践的过程中，解除社教化中成为统治者眼中的“顺民”的训练，填充香港空间的意义，重述香港地方的历史。在这半年期间，有两次行动可资说明。

二零零七年一月二十一日，皇后码头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仪式：人民登陆皇后。码头的保卫者以一艘被命名为“本土号”的船，载着近一百人（当中包括不同重建区的街坊、新来港人士、关心历史文化保育的团体、工会成员、非政府组织成员、进步知识份子、运会运动前辈、外佣团体等），浩浩荡荡由尖沙咀起航至皇后码头登陆。行动的讯息一目了然——香港的土地曾经是以殖民者的登陆而成为不由自主的国度，回归十年情况亦未因主权易手而出现转变，则香港人需要以集体行动宣告，谁是香港真正的主人，谁才是香港历史、社会、文化发展的无名英雄。保卫者还预备了两条各五十米长的横额，由所有参与者写上了其心声，绘满了意味深长的画，在码头登岸之处由登岸者领到大会堂前原本由港督主持升旗仪式的检阅台。大会堂、皇后码头和爱丁堡广场整个空间，顿时人声鼎沸旗海飘扬鼓声震天，几乎让人错觉这片公共空间正式宣布独立。

三月十八日，时值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一场全港七百万人只有八百人有投票权的“选举”）前一星期，码头的保卫者和不同的社区运动、居民运动的团体，发起了一场



游行，争取香港空间规划的民主化、要求规划的过程和机关尊重社区的历史、文化和有机地形成的网络。香港一般游行的原则，是人数至上，大街大巷至上。然而，三一八游行因为连结了不同社区运动的团体，争取属于旧社区的权利和尊严，故游走于旧区的横街窄巷，在旧社区的现场宣示团结，便成为一场保卫旧区免于全面被高楼大清洗的游行的理所当然的路线。路线更途经汇丰银行于中环的总行，即星期天休假外佣的聚脚点。队伍途经该处，随即与外佣合唱团结的歌曲，亦有发言互相支援——只因作为香港职业女性的家务劳动替代人员，她们长年累月对香港经济发展的贡献，从来便被忽略；作为本土社群的一部份，她们也是被拒绝的。队伍中除了年青人外，也有在各个旧区居住和建设了几十年的老街坊，游行之于他们既是向外宣扬讯息，亦是向内加强团结。最后，游行队伍挺着一块几十平方米，由基层妇女和艺术家编织而成的百家布，有尊严地完成游行路线，抵达终点站皇后码头。

事实上，游行队伍不断被便衣警察渗透，被军装警察以各种秩序理由拦截。或许如此的参与者的组合、如此的游行主题、如此的游行路线，对有着某种不可理喻的官威传统的警方而言，完全摸不着头脑。结果一位受人尊重的重建区街坊在游行后发言时竟遭警方不礼貌地中止，而一位艺术家朋友亦在游行完结后，遭掩饰自己重案组身份的便衣警员无故截查。这场保卫香港本土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不是已经越过了一直以来在当权者理想的“顺民”的界线外，游行参与者所受到的对待实在难以理解。

从登上推土机的一刻开始，保卫码头的运动者便从一种不一样的介入点靠近解殖的彼岸。回归的一刻，政权由原来的宗主国英国移交到中国的北京政府，各界预计由政权移交所引发的转变，回归差不多十年后的天星码头皇后码头保卫运动的雷达差不多扫描不到，亦没有以这大历史上的一刻间的差异，作为其观照自身状况的理所当然的参照点。相反，似乎是名义上有变而实质管治关系的不变，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触发了一场真理事件，为忠于真理事件的主体提供判断和行动的坐标。

管治者透过土地限制香港人的生活空间及归属意识，而码头的保卫者，则在街头正面迎击，在街头巷尾，捡回属于本土的片段，重组本土的世界。而事实上，政治和社会的抗争和异议在香港的历史上绝对不是缺席的，由码头保卫运动所开展出的解殖语境，要求保卫者承先启后，从过往的异议历史中，了解今天能行使的自由和权力的沿革及限度，并由此思考和实践摆脱回归后还残留或强化了的枷锁，真正感受作为香港这地方的历史主体。将“本土”、“庶民”等受支配、被动的客体，正式宣布为具自主性、能左右城市走向的主体。这尝试并不在中立真空里进行，更并非无关痛痒——视之为回归十年忍无可忍的历史任务，该不算是意图不轨的自高身价。

后话



回归前突然出现大量由国内学者出版的香港史著作，抗衡一直以来英国人对香港的历史论述，曾令不少论者慨叹没有从香港本位出发的历史：不单止主权是伦敦和北京政府的争拗对象，即连对主权的论述，香港也从来不由自主。针对这情况，回归前后曾有一批年青的学者和知识份子对过渡期的香港文化作批判性的研究。

当时的文化评论，不少是在一个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中，不无自贬地把香港理解为“边缘”、“夹缝”、“混杂”，描述八十年代以还香港被伦敦和北京政府排斥的现实。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意识，而得力于后殖民批评的引入，另一批论者便指出“两种政治策略都不能妥善处理复杂多重的后殖民香港身份，反而往往成为文化北进反攻大陆的不在场证据”。辩论的因为笼统的定性而起，而止于特定的反证。另一方面，以菠萝包、茶餐厅等作为香港文化的特征的论述，无疑贴近生活且能在前途谈判的一片无力感中找到香港人肯定自身的立足点。

这些对香港文化作描述和分析的例子都立足于特定的论辩和历史情境，本就不是要处理香港人的解殖状况，亦无法对之延伸有视野的讨论。面对当前香港庶民社区被逐渐消灭，殖民遗产在香港有全盘的历史清算前已被埋葬，或与资本结合成全新的消费空间等问题，不难暴露出学界评论界对香港解殖任务的忽视。这不止是在一个超级市场内少了一个牌子的货品，而是我们是否付得起埋没一段段对香港走到今天举足轻重的历史的责任，是否真的提不起意志找根据想策略解除历史遗留下来的殖民枷锁？

已几近成为经典的印度庶民研究小组，早于八十年代初（约于其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三十年后）已开始专注研究一众在南亚社会在殖民时代的社会变迁。庶民研究系列的首位主编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中给他们自己开出的研究对象：人民政治。“在整个殖民时期，印度政治存在着另一种与精英政治领域并行的领域，其中的主角不是本土社会的统治集团殖民政府，而是由广大劳动者构成的庶民阶级和群体以及城镇和乡村中的中间阶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这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因为它既不是产生于精英政治也不依赖于精英政治而存在。”

由前途谈判起到回归十年后的今天，香港已走了近三十年光景，即使无需将回归一刻视为浓缩了一切历史问题的金钻一刹，对于香港解殖情状的分析之空白或难产仍是令人相当尴尬和沮丧。香港社会如何走到今天、小市民（有别于正史主力记载的华洋精英）的自强抗争、对人民如何（无法）构成社会的进步力量等问题，香港要是希望走出殖民情状，对上述问题认真而批判的认识和清算实在是逼在眉睫。

原文刊于《今天》二零零七年第二期。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许知远：爱人同志



专栏作家

“

倘若你不能动员社会力量，不去保卫自己的生活，又怎能得到民主与自由。香港曾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面对挑战时，人们常选择离去，这座城市必须建立起本土意识。

”

一

司徒薇是在一个劳工研讨会上认识陈允中的。她刚到洛杉矶不久，攻读比较文学。在参加者寥寥的会议上，他们很难不记住彼此。一位是热心的组织者，另一位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但坐在第一排，还一直在做笔记。

不过，他们对彼此没有太好的印象，都仅是不合时宜的学生。两年后，在一位共同的朋友纪大伟的介绍下（日后，他成了台湾赫赫有名的同志作家），他们算是拉近了距离。不过，爱情仍要迟些到来，他们只是被彼此的年轻、漂亮的身体吸引。

“他第一次约我，就约到他家里泡温泉”，讲起 15 年前的往事，司徒薇半笑半嗔，“我想，这不去就显得太小气了。”

与马来西亚游子陈允中不同，这位司徒小姐来自于一个香港的优渥家庭。从广东开平来的司徒家族是个大家族，那位赫赫有名的司徒华也是她的亲戚。她的父亲是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官员，家庭中很多人从商，似乎从很小开始，她就对香港的政商两界就有了解。最初，她是被当作别人的太太培养的，17 岁就有了第一次相亲，她却不是个驯服的孩子，她可没准备成为别人的乖太太。

1989 年，她进入了香港大学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两种平行又相互纠缠的认知旅程开始了。在她的学术领域，这正是后殖民理论的繁荣时刻，从亚洲到非洲，不同时空与地域的文学与社会都涌到她眼前，这些看似摆脱了殖民者，却无法建立起自身的制度与价值观，反而陷入了新的溃败。这风起云涌的“后主义”也给她这样一种影响，所有的权威都瓦解了，没什么东西不能挑战。



这一年的天安门事件则促进了她的中国意识与香港意识的觉醒。“中国像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她这样说起最初的中国印象。她是个狂热的阅读者，从鲁迅、鸳鸯蝴蝶派到朦胧诗，她都有所涉猎。当北京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时，她本能的反应是这是另一次“五四运动”，拼命地想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当坦克碾过长安街时，这种理解不仅是兴趣，而且变得不可回避——香港正是要回归这个中国。她也旋即发现，她不仅不了解中国，连自己成长的香港也不太清楚。

从 1989 年到 1997 年，她的青春期是在香港这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回归情绪中度过的。很多香港人离去，留下的人则惴惴不安，民主运动在这种悬而未决的气氛中热烈起来，它也催生了相应的社会觉醒，带来了社会运动。她和朋友们邀请李柱铭与司徒华来演讲，也与“长毛”（梁国雄）喝酒聊天，听他的革命理论，她也拿着摄影机去拍摄天台屋运动，这是香港第一个保护旧社区的自觉运动。

前往美国留学的计划一直推到 1997 年秋天，她要目睹回归的一刻。她记得那年，夏天一直在下雨，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种无法排解的郁结中。“所有不打电动玩具的朋友都在打电动，不唱卡拉 OK 的朋友去唱了”，她回忆说。她也想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 1989 年底，一种不想过去、也不知未来的飘乎感。她感到一种强烈无力感，觉得什么都不能做。

不过，只有在很少的时刻，无力感才会出现在她身上。与司徒相处时，你可以感到那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似乎这世上没什么不可实现之事。这与允中犹豫、自我怀疑，恰成对比。倘若允中在对他人的感受中寻求行动的力量，司徒依赖的是理念，是她经年的智力训练。

听她谈话，就像是在各种概念中穿梭。她是个西方左派的好学生，准备把一切问题归结于“新自由主义”，而香港的确也是好的实验地，这个城市长期以自由市场的楷模著称，而影响不断增强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更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极端形式。

她认定的香港的新社会运动是从 2004 年反 Disney 的“猎奇行动”开始的，因为“以往的社运是面对政府，但从这个运动开始，也开始面对官商勾结与跨国资本”。而日益严重的“中国因素”，是这种官商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可能也是最恶劣的形态。

对她来说，香港表现出的某种倒退，也并不为怪，从后殖民理论出发，一些殖民地国家和地区常迎来一段时间的衰败，殖民者走了，新秩序却无法建立起来，陷入政治、经济与社会全方位的衰败，甚至引发内战。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不同，摆脱旧殖民者时的香港，经济发达，很少人把它放在这个框架里看待。而且，香港又有了新宗祖国，它的转变过程远比“一国两制”所涵盖的要复杂得多，“它是从一个殖民地状态，过渡到另一个殖民地”。这个城市也缺乏外界描述的开放性，几个大家族控制着主要资源。对她来说，不管是当权者还是民主派，整个香港沉浸于一种新自由主义的主流论述，反对者还没找到自己的反抗



语言，也没有被逼到非反抗不可的地步。她似乎仍对这个城市保持着淡淡的疏离，她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没什么期望，“他们需要更苦一点，更痛一点”。

在某种意义上，她比允中更显得“无根”，她自足，不需要具体的社区、人群甚至行动自我证明。她的意义感来自于自己的头脑，当然还有允中。

“人人会讲左派理论，只有他会实行”，在洛杉矶时，允中给她这样的触动。接着，她发现这个行动者的脆弱，“他英俊、学历好、个子高、有能力，任何男孩有这样的条件，都骄傲不得了，他却一点也不自信”，打动她的还有他的罕见的利他主义“他怕为自己着想，为别人他做什么都可以”。

二

陈允中仍偶尔被噩梦惊醒，梦中人（是自己，或是村民）被推土机铲成了一半。这个梦境吓了我一跳，我没想到这些抗争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他的内心，在他常欢快的外表下，有着这样的焦虑。

尽管他说自己的失败感很短，但偶尔，他也会表现出某种沮丧。在政治上，他对泛民力量失去了信心，最大的民主党除了六四与普选，似乎就没有其他议题了，对于社会发生了哪些变化，丧失了感受力。而即使 2017 年与 2020 年的普选都实现，香港的民主也一定会与人们期盼的不同。

他深知中国共产党的渗透与组织能力。在科技大学任教时，他发现学生会几乎被改造，比起来，当年国民党对台湾校园的控制实在是小儿科。至于选举，在他的拉票经验里，香港的民主派，完全欠缺组织能力，而北京支持的建制派有无限的资源，它用无处不在的、街道办事处的方式来拉拢、收买选票。

至于社会运动与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它们虽赢得了舆论的瞩目，却并未缔结成更实质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个社会真正有实力的人物尚未站出来，发出反对的声音。在他看来，台湾的变化是来自本土精英的联盟的反抗，站出来对抗、并为此承担代价的是医生、律师与大学教授。“占领中环”象征了少许改变，但它离真正的牺牲与代价，仍有着明显的距离。

香港的社会运动，不管是环境、劳工、妇女都仍未能蓬勃展开，联结在一起。况且，有一种天然的反党派、反组织的倾向。这些力量分散，难以汇聚成直接的政治变化。



马来西亚再度吸引了他。他刚刚匆匆飞回了诗巫，参加了第 13 届全国大选的投票，很多自由派人士期待安瓦尔领导的反对党能击败执政党。诗巫的一份华人报纸用这样的报道来欢迎陈允中：25 年前离乡背井诗巫人陈允中，回国履行公民投票义务。

大选还是输了，这也让陈允中更意识到，民主之路该是多么漫长。不过，他觉得故乡真是变了，一场巨大的政治觉醒正在发生。“不要再用种族政治的眼光来看待马来西亚了”，他不断对香港的朋友说。

他也不由想起更年轻时的梦想，他在台大时，就希望把台湾经验带回马来西亚，而前往美国读书则也是为了家乡，“如果我回马来西亚搞革命，如果是个博士，就不至于死在牢了没人知道”，如今他不仅是博士，还是教授。

“我想慢慢准备，离开香港，再回去”，在一个夜晚，他对我说，他给自己设下的期限是 5 年（恰好是 2017 年普选后），在这期间，他要把工作一点点交出。

司徒薇也会和他一起回去，无论如何，一个陌生的地方、一场陌生的冒险总富有诱惑。

讲起离去，他又不由伤感。“我的一切经验都来自香港，我的思想也是在这里成熟的”，他不止一次地说。他在台北、洛杉矶不管多么忙碌，仍是个学生，不需要承担真正的责任，但在香港，他是个成年人，在很多青年人眼中，还是导师，不仅介入、还要承担责任。

十年前的北京东三环，此刻的新界乡村，我毫不怀疑，十年后我会在诗巫的某个居所，再碰到陈允中，而且仍会像当初那样被他的单纯与热忱打动。而司徒薇仍坐在一旁，一头短发，穿着她宽松的白裙，不断的插话……（待续）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梁启智：香港人的三个中国



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课程副主任

“

中国的危险和可怕，对应出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当中国变成了一个游乐场，香港人也就成为陈百祥所述「where 银 where 过境」的征服者，妄想香港对中国殖民；而面对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香港人又会忽然变身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道维持者……在这些想像之下，香港的定义，就是非中国。

”

国民教育争议之后，又来到新界东北发展争议，中港矛盾之火再度燃起。我们今天说要捍卫本土，到底香港人从何而来？回顾历史，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一直被中国认同所纠缠，无论是毫不犹豫的热血拥抱还是刹有介事的划清界线，其实都没有放开中国作为必然参照。为何兜兜转转数十载，香港人仍然未见庄敬自强的本土意识？这一切，或者可以从十年前许鞍华导演的电影《男人四十》，当中的那条罗湖桥说起。

今天的香港已有十四个出入境管制站，但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分隔却仍然以罗湖作为最有力量的符号。客观来说，罗湖每年九千多万的旅客数目远远抛离其他口岸，在罗湖排队过关是香港人的集体记忆。同样重要的，是数之不尽的香港电影和电视剧对罗湖桥的描绘，都把它看成是一道门，一个区隔，分开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电影《男人四十》当中对罗湖桥的描绘就甚为生动。电影的主角林耀国（张学友饰）是中学老师，和他的妻子陈文静（梅艳芳饰）原是中学同学，其中一幕提到他们这个家庭的诞生，原来是陈文静怀有她当时老师的孩子所致。陈文静向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回述当年本来要把他打掉的场面，对白就由一句：“火车到了罗湖桥”开始，而画面出现的则是一间相当简陋的妇科医院，房间尽是用掉的玻璃药水瓶，外面推满垃圾泥土。

这一个中国是可怕的、恐怖的，和叫人感到惶恐无助的。这也是许多香港人对中国内地的印象，深圳的别名就是“心震”，在街上随时都要担心小偷抢劫，坐车说不定还会被全车掳走，甚至说在酒店一觉在浴缸醒来，看见字条说肾藏已被割掉。都市传说或者是危言耸听，但夜店大火死伤无数却是事实，在路边吃饭随时吃出地沟油也是事实，害怕的心境不一定是空穴来风。



回说《男人四十》，自此之后林耀国再没有回去中国大陆，毕竟之前的记忆过于深刻，连友人都认定他没有回乡卡。然而到了他第二次在罗湖过关，竟然是带着和自己关系暧昧不明的中学学生，去探望因生意不景把酒吧搬到蛇口的友人。这家酒吧热闹俗套，什么民俗舞表演魔术师杂耍一应具全。结果在灯红酒绿之间，林耀国喝醉了，没赶及过关回港，这次轮到他和他的学生在深圳渡过了一夜。

这一个中国，同样是危险的。但这一种危险和妇科医院的那种危险不一样，虽然同样杂乱无章，揭示的却是诱惑。中国仍然是一个充满不可预知的地方，但却因此而充满吸引力。回想九十年代中期，人人都说中国就像是当年的美国西部，尽管毫无法纪，却也是冒险家的乐园，淘金者的天堂。一切本来在香港不可逾越的禁忌，在中国则齐齐“解放”了。

这两个中国，既相反，也相通，甚至可以说是一体两面。它们同样代表了当代中国的神秘，分别在于香港处于其中的角色。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男人四十》还有第三个中国：一个未必存在的文化中国。这个中国虽然虚无缥缈，却在许多香港人的心中提供安宁，一个不想面对前面那两个中国时的庇护场所。

电影中的林耀国教中文（电影中刻意古雅地称为国文），从小到大满口唐诗宋辞，每天上课和学生谈中国文化如何博大精深，然而他自己从来不回中国内地。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他诉说的中国，是文化想像的中国，是只存在于文学当中的壮丽山河，和现实不一定要相关连。电影以林耀国和妻子二人决定在离婚前同游快要被三峡大霸淹没的长江山水作结，就点出这第三个中国的虚无。

从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九七后的一段时间，这三个中国主导了香港人对中港关系的想像，也间接塑造了香港人自身的身份认同。中国的危险和可怕，对应出香港的安全和稳定；当中国变成了一个游乐场，香港人也就成为陈百祥所述“where 银 where 过境”的征服者，妄想香港对中国殖民；而面对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香港人又会忽然变身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道维持者，虽然日常口语总是粤英夹杂，却还是要义正严词的指责共产中文破坏文化承传。在这些想像之下，香港的定义，就是非中国。

这些想像当然每一个都有问题，每一个都是以偏概全，却都出于香港人的民间生活。就是这三个中国之间的随意互换，才容许香港人可以八九年后的两年之内先拍摄了一出《表姐，你好嘢！》取笑内地人，又再拍摄一出《豪门夜宴》为华东水灾筹款。

但这些都是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了。近年中港矛盾越演越烈，背后反映了这三个中国的同时面对急速转变，香港人对中国失去了原有的情感标记。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要把整个中国都想像为蛮荒落后已不可能；至于回内地掘金的美梦，在近年来内地的国进民退当中也找不到落脚之处。如果硬是要把当年的想像套进今天的情景，那个一体两面的危险中国只能阴差阳错的在来港扫货的内地豪客身上转世再生：他们既可怕，又神秘。

至于那个文化想像的中国，在今天的香港则更欠吸引力了。在九七以前，香港人无论对北京政府如何害怕，毕竟还未至于是切身之痛；来到今天，我们每日面对特区政府的种种无能，也清楚知道香港政局纷繁最终源于北京，则继续把对中国的认同寄托于名山大川已变得极为不合时宜和软弱无力。

没有了原来的三个中国，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该怎么办？香港其实已经早早越过了所谓的“临界点”，对中国的各种想像也不能也不应再走回头路，以香港本位的本土呼声也只会越来越高。无论是把这些要求自主声音批为数典忘祖，又或无限上纲的把和中国相关的一切拒之门外，其实都没有解决问题。不如回到基础认真研究香港混杂多元、中外交错的社会和历史，从此重新孕育香港的本土意识，方能在变局中更能站稳阵脚。

原载于茶杯杂志，2012 年 10 月。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施钰涵

设计：潘雯怡

校订：季文仪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